预言中国未来趋势的撼世之作，轰动全球

彻底颠覆西方“中国崩溃论”、“历史终结论”的论调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By Martin Jacques

当中国统治世界

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

[英]马丁·雅克 著

中国模式　文化根基　经济命途　全球秩序

探析中国现代性八大特征　把脉中国未来发展趋势

倾力推荐

吴建民　欧洲科学院院士、副院长

胡鞍钢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

金灿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阎学通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主任

余永定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

黄纪苏　著名学者、剧作家

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当中国统治世界 序言

《当中国统治世界》是马丁?雅克先生的最新著作。作者凭其多年的东亚国家游历，以丰富的历史知识、智慧幽默的文笔，对当今时代的发展潮流发表了独特的见解，取得了很大的市场成功，《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新闻周刊》等各大媒体的纷纷报道，充分说明本书引起的广泛重视。在写作过程中，马丁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欧洲中心做过访问学者，笔者也有幸多次与之交流。

乍听书名，不禁有耸人听闻之感，但细读本书后，发现全文分析持平、冷静。马丁是为数甚少的对中国有所偏好的西方作者之一，所以在描述中国的情况时，大量选用中国方面的材料，更加贴近中国的现实。

作为一个学者，笔者认为本书在理论上存在几个鲜明的特点：

（1）世界上实现现代性的方式绝非只有西方模式。作者在第4章中提到：未来世界不只存在一个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现代性，还会有很多其他的现代性。虽然马丁不是第一个提出这种观点的学者，但他列举中国的例子来证明这个观点，显然很有新意。

（2）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从1648年国际关系进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组成国际社会的基本单元，并习惯于用“民族国家中心观”来分析问题，但这并不适合于中国。已故麻省理工学院白鲁恂（Lucian Pye）教授曾有一段经典言论：“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她更是一个有着民族国家身份的文明国家。中国现代史可以描述为是中国人和外国人把一种文明强行挤压进现代民族国家专制、强迫性框架之中的过程，这种机制性的创造源于西方世界自身文明的裂变。”这段话为中国研究开辟了全新视角，在如今很多西方学者和海归学者都继续沿用“民族国家”单位来分析中国问题的背景下，本书作者坚持从文明国家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实乃对中国研究方法论做出的一大贡献。

（3）作者关于“中央王国心态”（mentality of the Middle Kingdom）的分析，也是对中国特性研究的一次勇敢尝试，且不论其观点到底有多么准确，至少能让中国读者了解到西方学者对此问题的看法，起到兼听则明的效果。

在本书观点中，最容易刺激西方人神经的观点，应该是“中国崛起远远超出经济的范畴，包括文化、政治等多方面的崛起，而且中国崛起的影响远大于美国崛起的影响”。笔者个人认为，要准确判断当前中国所处的状态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目前中国处于工业化的高速增长时期，经济发展势头堪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媲美，但是同时社会却陷入了严重失序（disorder）的境地——旧秩序在消失，新秩序尚未建立，所以中国是当今大国中情况最复杂、内部矛盾最多的国家。这给社会科学各领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毕竟现有的社会科学都是根据北美、西欧等地区人们的集体心理和集体行为总结出来的，所以在解释中国问题时显得比较苍白，缺乏信服力。在此，笔者建议用“双重特性方法”（dual identity approach）分析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

中国是处在现代化中的巨型国家，用一般意义上的“大国”来形容中国不甚妥当。根据农业专家的观点，从粮食消耗量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人口实为14亿，相当于包括俄罗斯欧洲部分在内的整个欧洲的2倍。另外，中国目前的发展速度极快，过去60年中国现代化的成就基本上等于欧洲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200年。经过百年的探索，中国目前已经基本适应工业文明，在农业文明时期表现卓越的中国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过程历经痛苦，但是取得的成就也非凡无比。随着中国的崛起，工业文明的历史正在进入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工业化与欧洲千万级人口的结合；第二个阶段是工业化与美苏1亿级人口的结合；而在当前的中国，工业化正在与10亿级人口结合，其世界史意义无论怎么估计都是不过分的。这些都是中国故事的一个方面。

中国故事的另一方面，便是庞大的巨型国家内部面临的众多现实挑战和不确定性，现实方面的挑战媒体和学术界天天在述说，这里就不谈了。笔者更看重的是中国古代传统和近代传统中的问题。自宋朝之后，中国内部开始出现势力强大的文明*（非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上的“*”），导致内部衰败和外部入侵。尽管中国文明在接受现代化洗礼的过程中，采用了反思、革命、改革等多种手段遏制文明*，但结果如何却仍无法知晓。另外，从晚清开始，中国精英层就开始反思中国的文化，其中还出现过两大反思高潮，即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新文化运动”思潮和80年代以来的“思想解放”思潮，近百年的反思使中国文化取

得了斐然成就，使我们能够用现代学理来梳理传统文化，但也不乏错误思潮，“文学家式的批判主义学统”便是其中之一。这种思潮的特点是感性而非理性地看待中国，虽然能准确意识到中国存在的问题，却无力理解、分析和解决问题，所以最终只能“我骂故我在”，以激愤的批评代替冷静的分析，以偏概全，以点带面，其逻辑错误在于将中国人在一段时期内未能成功应对工业文明挑战的现实归结为中国人不行、中国文化不行，犯下“不完全归纳”的逻辑错误，造成中国人由此丧失自信、丧失主体的恶果。也正是由于这些因素，中国人后来学习苏联时变得比苏联还“左”，学习西方时变得比西方更“右”，完全丢失了自己的根基，没有了自己的特性。马丁的书提醒中国人从这个意义来看待自己的根，如果最后真能发挥这样的功效，那将是马丁的贡献，中国学术界的悲哀。上述种种历史和现实问题使我们对自己国家的前途处于一种不太确定的状态。

总之，中国在走向工业文明的过程中，已经取得了初步成功，如果中国能够作为一个成功的农业文明重演工业文明的辉煌，那将是人类历史的奇迹。对于今天的国人来说，重要的应该是进一步努力，使自己的国家完全实现工业化；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不仅应该从理论准备、知识储备和产业技术等方面参与现代化进程，而且应该向国内人民和外部世界解释好自己国家的文明和路径，减少彼此文化理解中的障碍，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使崛起的中国更早更快地被世界接纳，同时也为全球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金灿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导言 中国：正在改变世界（1）

“全球化远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它其实相当复杂：美国可能是全球化竞技场上最有影响力的‘球员’，能够对数轮全球贸易谈判施加很大的压力，但最终的赢家却是东亚，最大的受益者则是中国。”

1945年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的主导力量。即使在冷战时期，美国的经济实力也遥遥领先于苏联，其经济规模是后者的两倍，军事实力和科技能力也无比强大。“二战”以后，美国是创建一系列国际或全球机构的主要推动者，例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些举动都证明美国已经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全球实力和权

威。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瓦解了，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增强。同时，还促使苏联解体后的部分领域和国家开放了各自的市场，并转而寻求美国的帮助和支持。

一个国家拥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力，在历史上是前所未见的，即使当年处于最鼎盛时期的大英帝国也无法与当今美国的综合实力相提并论。美元成为世界通行的货币，绝大多数贸易都是以美元来进行的，绝大多数国家的货币储备也都是美元。除联合国以外，美国主导了所有的重要全球机构，其军事影响力遍及世界各个角落。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似乎无懈可击，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人们习惯用“超级实力”或“单极”等词语来描述这支新兴的、独一无二的力量。

全球最强实力的接力棒，在传到美国手中之前，一直都是由欧洲掌控的，尤其是主要的欧洲国家，例如英国、法国和德国，还有早先的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从18世纪末叶的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到20世纪中叶，欧洲一直以一种影响极其深远的方式塑造着世界历史。工业化是欧洲活力的动力，殖民征服是欧洲扩张的惯用模式。虽然“一战”之后，欧洲的地位日益衰落，尤其是1945年之后，更是急剧下降，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美国作为新崛起的力量，实际是欧洲文明的产物。美国充当了旧世界和新世界沟通的桥梁，一方面使其表现出西方的一些理念，另一方面也舒缓了同英国的潜在竞争关系。200多年的时间里，全球一直都为西方所主导，首先是欧洲，后来是美国。

现在，我们正在目睹一种历史性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还相对处于初级阶段，但是它最终必将改变整个世界。在经济规模方面，发展中国家正在急速地撼动着100多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美国、加拿大、西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的主导地位。1973年，发达国家约占全球GDP 的60%，而到了2001年，这一比例下降为50%。当然，哪怕是发展中国家中最先进的国家，要想获得与发达国家同等成熟的经济和技术实力，也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因为它们拥有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而且它们的经济增长率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所以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已经导致了全球经济重心的偏移。当前有几种现象可以阐释这种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

世纪之交的时刻，过去20多年来持续下滑的商品价格终于开始回升，这正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的结果，直到

遭遇全球经济衰退，这一趋势才得以逆转，至少从短期来看确实如此。与此同时，东亚经济体在经济领域的出色表现，给它们带来巨额贸易盈余，也使其外汇储备急剧膨胀。这些国家把部分外汇储备投资于主权财富基金，尤其中国和新加坡，旨在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大宗商品生产国，尤其是那些盛产石油的中东国家，也从它们的巨额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投资于类似的基金。由此，主权财富基金获得了强大的资金优势，它们手中掌握的资源，显然正是西方金融机构所缺乏的。2008年9月，华尔街几家金融巨头的倒闭，加剧了世界经济重心从西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态势。一些资金受困的金融大亨转而向主权财富基金寻求支持，同时美国政府极力挽救住房抵押贷款巨头房地美和房利美，部分也是为了消除中国等国家的疑虑，因为这些国家向房地美和房利美投入了巨额资金。如果投资国撤资，美元必然会大幅贬值。金融危机生动地体现出东亚国家与美国之间的不同，前者资金富足、多年盈余，而后者资金短缺、数年赤字。

导言 中国：正在改变世界（2）

如下图所示，根据高盛的预测，到2050年，全世界最大的三个经济体，将是中国、美国和印度，然后是巴西、墨西哥、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只有两个欧洲国家位列全球前十大经济体，即英国和德国，它们分别居第九位和第十位。在当前的G7组织中，只有四个国家位居前十。普华永道也做出了类似的预测，认为到2050年的时候，在经济规模上，巴西将超过日本，而俄罗斯、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等经济体也将超过德国、法国和英国。如果这些预测或类似的预言果然成真，那么在未来的40年里，世界将会呈现出一幅完全不同于当前的景象。

对国民经济规模的预测*

*对国民经济规模的预测以2006年的GDP为基准。

这种情形，与人们在2001年时的想法大相径庭。“9?11”事件之后，美国不仅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且还尝试在全球扮演一种能反映其全球影响力的新角色。为了开创新美国世纪，切尼、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等人于1997年成立了新保守主义的智囊团，他们通过了一项原则声明，表达了有别于以往的信条，为布什政府奠定了基础：

“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美国成为世界的超强动力。在领导西方赢得冷战之后，美国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在过去几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美国是否具有继续驰骋纵横的远见？美国是否有决心塑造一个遵守美国原则、维护美国利益的新世纪？”

2004年，极具影响力的新保守主义者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写道：

“1991年12月26日，苏联解体，世界形势大为不同。美国作为其他国家无法匹敌的唯一力量主导了单极世界，其决定性的影响力遍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是人类历史自罗马帝国衰落以来的又一次意义深远的大变局。”

全世界人民都深深地意识到，新世纪已经到来了，未来的世界将是美国一国独大。新保守主义者喜欢从苏联解体、美国拥有举世无双的军事优越性的角度来解释世界，而对经济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却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新军事准则着重强调美国保持领先于其他国家的军事实力，以便遏制潜在对手的重要性，以及美国应当寻求自身利益而非受对手或国际条约的限制。在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军费开支几乎相当于世界其他所有国家军费开支的总和（见下页图），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对其他所有国家存在如此巨大的军事优势。与先前的政府相比，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反恐战争成为首要任务，美国与西欧盟友的关系退居次要地位，任意诋毁国家主权原则、坚持声称政权更迭、入侵伊拉克的行为将布什政府的这些政策推向了顶点。但是，美国并没有主导和重塑全球事务，它很快就发现自己陷入了伊拉克战争的泥潭，国际社会的支持率也下滑至1945年以来的最低点。事实证明，在伊拉克实施强大的军事威慑效果并不明显，相反还损害了美国1945年以后慢慢积累起来的“软实力”——用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话，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理念和政策的吸引力。未能理解更深层次的经济趋势的含义，加上对伊拉克局势的错误判断，布什政府过高地估计了自身的实力，所以其制定的外交政策只能取得适得其反的结果：不仅没有提高美国的全球地位，反而严重地削弱了它。新保守主义的观点是对历史的一种灾难性误读。

导言 中国：正在改变世界（3）

2008年全球军费开支的分布状况（亿美元）

*澳大拉西亚，指大洋洲的地区，例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邻近的太平洋岛屿。

军事和政治实力都有赖于经济实力。正如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一书中所说，一个国家行使和保持全球霸权的能力，最终取决于它的生产力。美国之所以拥有当前超级大国的地位，正是它1870~1950年间经济快速增长，以及20世纪下半叶成为世界上最大和最具活力经济体的结果。这种经济实力巩固了其政治、文化和军事实力，并使美国的综合实力从1945年起变得令人惊叹。按照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估算，1870年，美国占全球GDP的，随后经历了一段比较壮观的增长期，该比例从1913年的上升到1950年的，紧接着又出现了缓慢的下降，到1973年约占，现在则保持在20%左右。考虑到美国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这一比例仍然相当可观，但是其长远趋势却已经显而易见。人们很容易将美国的情形与1850~1914年间维多利亚时代的不列颠帝国联系起来，因为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所以它享有领先于其他所有国家的巨大经济优势。但是，与美国1944年经济达到顶峰时约占世界GDP的35%（虽然当时的世界深受战争的蹂躏）相比，英国1899年经济状况最好时，还不到世界GDP的9%，到1998年则下滑至仅约。随着经济地位的迅速恶化，英国作为曾称雄半个世纪的世界大国的地位也急剧下降。即使英国追随美国征战伊拉克，它能做出的军事贡献也是微不足道的。要称霸全球，打造一个正式或非正式的帝国，前提条件就是雄厚的经济实力。至少从长远来看，这是一个客观的尺度——但是江河日下的列强们似乎总是在否定这一事实。当前的情形与1918年后英国的情况很相似，布什政府（也许奥巴马政府不是如此）没有看清形势，没有看到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在世界舞台上的权力正在大大缩水的事实，而是一相情意地认为在一个新美国世纪，美国将会主导整个世界，在这方面，美国犯了与英国同样的错误。

据估测，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花费的总预算和经济成本大约为3万亿美元。即使军费开支如此之高，军队还是感觉捉襟见肘。部署时间越来越长，重新部署的次数越来越多，长期服役的士兵越来越少，招

募标准不断下降，军队失去了很多非常优秀的士兵，选择早早离开的军官也不在少数。这便是美国入侵伊拉克的高昂代价，更别提政治方面的恶劣影响了。而如果再入侵伊朗，其财政负担将会更加庞大：实际上，由于军事原因和政治原因，布什政府已经无力在其他两个它所谓的“邪恶轴心国”伊朗和朝鲜实施类似的军事行动。担负着维持庞大的全球军事存在的重任，加上800多个美军基地星罗棋布地散布在世界各地，正是美国发生巨额经常账户赤字的重要原因（2006年，美国的军费开支约占其GDP的）。未来时期里，美国将会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兑现这种军事承诺。美国已不再是主要的制造商或制成品的大规模出口商，东亚国家正在稳步占据这一位置。最近，美国一直处于入不敷出的境地：政府的支出超过储蓄，家庭也是如此，自1982年以来，仅有一年例外，其他时期美国的进口一直都大于出口，由此导致巨额经常账户赤字和负债。当然，经常账户赤字是可以慢慢弥补的，但是只能通过放缓经济增长速度和减少负债的方式。这将会进一步削弱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作用，而且侵蚀美国的金融力量。这并不表明短期内由于金融制约，美国必须减少其军事开支：实际上，鉴于军事在美国占据重要地位，以及美国外交政策着重强调军事实力，削减军事开支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身为“帝国”，这本身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随着其相对经济实力的持续下降，在未来的某一节点，美国自然无法维持这样的军事承诺，也无法保持目前压倒性的军事优势。

导言 中国：正在改变世界（4）

外国机构对美国巨额经常账户赤字带来美元持续贬值的担忧一直在增长，这一趋势持续到2008年，而且在未来的某个时点，这种担忧还会卷土重来。

2008年，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公司警告说，除非美国立即削减政府开支，否则在未来10年美国将丧失顶级的3A信用评级——3A信用评级是于1917年首先授予美国国债的。这是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而接下来，随着美国政府拿纳税人的钱拯救金融部门，美国的债务负担又将急剧扩大。

一个全新的世界

我们很快将要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但是已经能感受到要接受一种新鲜事物是多么困难：我们早已习惯了当代世界处理问题的套路，

从骨子里认定它们都是理所当然的，都是活生生的现实，绝非长期的历史周期变化的一部分。考虑到美国的全球霸权延续了几十年，西方的霸权地位更是历史悠久，这种想法不足为奇。我们习惯称当今世界是“西方的”，甚至是“美国的”，很少想到除这两种叫法以外的其他情况。而且，在其他国家仰慕的目光中，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享有很多既得利益。自然而然，霸权力量企图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条约灌输给附属国，后者将会因地制宜地进行调整和变革；如果后者没有做出令其满意的回应，它们就会将那些价值观和条约强加在附属国身上，必要时甚至采用武力等极端方式。因此，无论从心态上还是利益上，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都很难设想或接受一个自身影响力不断遭到削弱和缩减的世界。

以全球化为例。西方国家普遍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世界其他国家变得越来越西方化的过程，也即实行自由市场，接受西方资本、私有化、法律法规、*制度和*规范的过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西方国家确实付出了很多政治努力。同时，竞争、市场和技术等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强劲压力，促使世界许多发展中城市都出现了集中性和同质性，摩天大楼、高速公路、移动电话等就是典型表现。然而，由于各个社会的特定历史和文化之间存在着强大的对抗力量，所以最终会发展成各具特色的机构体系，例如家庭、政府和公司。此外，随着国家的日益繁荣昌盛，他们对自己的文化和历史更加自信，越来越不愿意效仿西方。全球化远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其实相当复杂：美国可能是全球化竞技场上最有影响力的“球员”，能够对数轮全球贸易谈判施加很大的压力，但最终的赢家却是东亚，最大的受益者则是中国。全球化进程涉及无休止的冲突：一方面，包括西方政治压力在内的全球力量不断融合；另一方面，各国也因碰撞而产生离心和本土化的趋势。

1960年之前，与世界其他基本上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相比，西方国家和日本享有巨大的经济优势，这主要体现在农业方面。但是从那以后，一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东亚国家和地区，逐渐缩小了与西方的差距。结果，现在越来越难以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例如，韩国和台湾地区，目前都被看成发达的地区。但是随着这些国家和地区逐步达到西方的发展水平，它们会变得更像西方，还是

更不像西方，再或是两种情况的结合体呢？显然，趋同的压力体现了前者，而分歧和本土化的力量又表现出相反的趋势。以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极大不同，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上。只有当这些发展中国家都能达到西方发展水平的较低层次时，探讨趋同或分歧的问题才比较恰当。西方主流观点认为，只存在唯一一种实现现代性的方式，那就是走西方式的道路，包括接受西方制度、价值观、习俗和信仰，例如法律法规、自由市场和*规范。人们可能会补充一点，这是认为自己比他人更加先进和文明的民族和文化的典型特点：落后国家只有按照先进国家的发展道路走，才能逐步赶上。

导言 中国：正在改变世界（5）

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越来越拥有影响力的世界来说，这场讨论的意义是深远的。如果它们最后发展成类似西方的国家，换句话说，即实现西方现代性，那么新世界将与我们早已习惯的当代世界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以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西这四个国家为例，它们在本质上几乎无异于西方。这正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设想的未来，他预言后冷战时代将建立在一种体现自由市场和*等西方原则的全新普世主义上。如果它们实现现代性的方式有别于甚至完全迥异于西方模式，那么它们主导的世界将与我们当前仍然生活在其中的“西方制造”的世界完全不同。正如我所要讲述的，正是工业化进程使现代性变成了现实，直到20世纪中叶出现了少数例外的情况，这一看法才有所改变。所以，在20世纪下半叶之前，西方国家实际上享有垄断性的现代性（其中日本是个特例），因为只有这些国家经历了经济腾飞。可能有人认为，前苏联模式也是一种现代性方式，但是从人均GDP、农村人口所占比例以及技术水平等方面来衡量，苏联与自己声称的正好相反，它依然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此外，尽管苏联是个欧亚国家，但它却是一个传统的欧洲国家，沿袭了很多西方传统。

日本是一个特例，我将在第2章中予以探讨。“二战”之前，日本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并不太引人注目，直到19世纪70年代它才开始了工业化进程。但是1945年以后，在经济方面，日本一跃成为西方国家的一个强劲对手，到80年代，更是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过，日本总是试图表明自己具备成为西方国家的特质，

尽量淡化自己的政治特色和文化特性。日本在“二战”中战败后一直为美国占领，直至1951年。日本接受美国制定的宪法章程，无权设立军队（日本的安全防护主要依赖美国和日本1951年缔结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它即使没有沦为美国的附属国，也只享有有限的主权。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日本尽管在文化方面与西方国家存在极大的差异，但是它依然不屈不挠地试图强调自己的西方特性。

直到前不久，除了日本以外，现代世界的成员几乎清一色地都是西方国家，包括欧洲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换个说法，便是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笔下的“西部分支”：欧洲国家本身、欧洲移民定居的国家以及欧洲后来征服的国家。所以，西方现代性，或者说我们迄今为止所知道的现代性，只构成了人类历史的一个小小的阶段。这些现代性经验或者是欧洲的，或者源于欧洲，它们完全或大部分共享着同样的文化、政治、思想、种族和民族特征。西方经验的狭隘性和由此导致的非代表性，通常容易被人们忽视，而这正是过去200多年中西方国家享有的主导优势。但是随着那些拥有异于西方文化、历史以及文明遗产的国家的现代性进程的启动，西方经验的独特性和局限性就越来越明显。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我们正处于这一过程的最初时期。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第一批东亚国家和地区——韩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新加坡，才开始了经济腾飞，到70年代，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一些国家才加入了这一行列，再后来是中国。一些特征曾经或多或少仅局限于东亚国家和地区——我指的是东北亚国家和地区（例如日本、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例如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越南等），现如今已扩散到其他地区，尤其是印度。1950年，美国GDP几乎是东亚国家的三倍，所有亚洲国家的二倍。而到了2001年，美国GDP仅仅是亚洲的2/3，同时也远低于东亚的水平。在本书第一部分，我将详细讨论现代性的本质，我认为世界上实现现代性的方式绝非唯一，我们正在见证一个丰富多样、相互竞争的现代性并存的世界的诞生。这正是21世纪的全新特征，我们迎来了一个我称之为“现代性竞争”的时代。

导言 中国：正在改变世界（6）

虽然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蓬勃发展，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才是最重要的经济体。她是新世界的开创者和驱动力，对新世界拥有日益强大的支配权，短短十多年的时间，其影响力已经遍及了东亚、中亚、南亚、拉丁美洲和非洲。中国大陆与韩国、台湾地区等早期的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不同，它从来都不是美国的附庸，同时还拥有庞大的人口规模。所以，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影响，是亚洲其他新兴国家所无法比拟的。然而，直到现阶段，西方国家还存在着一种共识，即无论是作为现代性的结果，还是作为现代性的前提条件，抑或是这两种情况的结合体，中国最终将变成一个西方式的国家。过去30多年里，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是以这种信念为基调的，它为美国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对中国的出口开放市场、赞成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允许中国成为日益成熟的国际组织成员提供了支持。

西方主流观点认为，从根本上看，中国的崛起不会对世界产生太大的改变。这种看法基于三个关键假设：从本质来讲，中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在适当的时候，中国会变成一个典型的西方国家；随着中国加入国际组织，接受并遵守其规章制度，国际体系仍然会一如既往。这些假设都是错误的。中国的崛起将会以影响极其深远的方式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

现在，全世界都能感受到中国经济崛起带来的影响，尤其是次贷危机之前许多消费品价格的持续下降和商品价格的上涨。中国的人口规模是美国的四倍，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了两位数，高盛公司预测，到2027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尽管那时的中国依然处于向现代经济体转变过程的相对初级阶段，这些经济预测可谓惊心动魄。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假定中国的影响本质上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呢？新崛起的国家凭借经济实力来追求更为远大的政治、文化和军事目标，是国际社会的铁律，这正是霸权力量的意义所在。中国也必将成为这样的一支力量，但是要西方国家去想象这种情形，似乎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由于占据全球支配地位的时间太长，西方国家已经用这些假设禁锢了自己的思想，已经无法做到从其他的角度去看待世界。它们习惯于用西方化的标准来衡量一个国家取得进步的程度，西方国家一直自认为是人类发展的最高峰，努力使“最西方”的形

容显得名副其实，而其他国家进步与否、进步多大，就看它西方化的程度如何。政治和文化上的差异，被视为落后的代名词，他们认为这将随着经济现代化的进程逐步消失。但是，认为中国将会顺理成章地变成一个西方式的国家，那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与西方几乎毫无共同之处。除非撇除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将世界简化成只关系到经济和技术的时候，才有可能得出中国变得越来越西方的结论。

在第5章中可以看到，东亚国家虽然在经历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欧洲殖民统治后，又被美国权势笼罩了半个世纪，但是它们事实上并没有西化太深，实在令人称奇。如果这个说法适用于整个东亚地区，那它就更适合中国的情况了。这里有四个主题，每一个都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它们共同刻画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不同点，其意义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可能在中国如何看待自身以及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和角色的问题上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这些主题构成了本书第二部分的内容，在此我简要概括如下。

导言 中国：正在改变世界（7）

首先，不应该仅把中国看成一个民族国家，即使目前她是这样看待自己的，其他国家也是这样看待她的。中国在现有的疆域内存在了差不多2 000年之久，但只在20世纪才开始认为自己是民族国家。中国人的特性早在断定自己是民族国家以前就已经形成了，这一点与西方不同。在欧洲和美国，人们的特性主要都是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表述的。通过不断地提及自己拥有5 000年的悠久历史，中国人意识到界定他们的不是国家意识而是文明意识。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不应该被首先看做民族国家，而更应该是文明国家。这个表述的含义是深远的：不能简单地认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大同小异。我将在全书尤其是第6章中详细探究这个问题。

其次，在民族观念上，中国与印度、印度尼西亚和美国等人口大国同样也有所不同。尽管程度各异，但后者普遍认为，它们生来就是多民族国家。像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占世界总人口的1/5）的国家，起先由众多民族组成，不足为奇，其中最大的民族是占全国总人口92%的汉族。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中华文明，可以解释这个现象，它激发了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同时推动了几千年来各民族的大融合。中国在对待*的态度上存在意识形态的成分：19世纪末叶，中国

日益陷入了欧洲、美国和日本等列强的包围之中，民族主义者为了抗击外来入侵者和推翻清朝统治，提出了“汉族”这一说法，获得了人们的广泛支持。但实际上“汉族”一词的作用，比起中国漫长历史带来的影响，实在是微不足道。在政治和文化作品中，民族往往是人们容易忽略的话题，但是对待民族和种族问题的态度，却是理解各个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正如我在第7章中阐述的那样，它们塑造和界定着中国人看待境内外的外国人的方式。中国人对待差异的态度，是决定中国作为一支全球力量将如何作为的强有力因素。

再次，直到100多年前，整个东亚地区都处于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所谓朝贡，是指邻国通过向中央王国（即中国）缴纳贡品，来表达对中国文化优越性和强大国力的敬意，以换取中国的仁爱和保护。众所周知，朝贡体系遭到了欧洲列强在东亚地区的殖民统治的破坏，被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体系（Westphalian Nation-state System）取代。那么，朝贡体系还有可能在该地区再生吗？一如从前那样，中国仍旧是该地区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欧洲很久以前就远离了东亚地区，美国在该地区的地位也正在逐步削弱。不要理所当然地认为遍布于该地区的洲际体系将继续沿袭威斯特伐利亚的版本。如果说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不同于以往的世界，那么从新生中国的角度来看，东亚已经处于被重新构筑的过程中。我将在第8章思考朝贡国家体系过去和未来的本质。

最后，中国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征，那就是她的统一性。西方曾一度普遍认为，中国将会以一种类似于前苏联的方式解体。这种观点源于对中国根本性误读的基础上。2 000年来，中国的疆域一直相对稳定。当罗马帝国分裂成众多小国的时候，中国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她统一的进程一直持续至今，尽管历史上曾出现过很长时期的割据现象。所以，中国可以成为一个容纳多民族的统一国家。这深深地影响了她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认识，也为她提供了（至少是潜在的）特殊的力量。庞大的人口规模将中国与除印度以外的所有其他国家区别开来。对中国统一性的本质和演进的探讨将贯穿本书，尤其在第3、6、7章着墨更多。

且不论我将在书中讨论的其他观点，单从文明国家、民族、朝贡体系和统一性这四个方面来看，显然中国历史极为独特，完全不同于

西方。任何一个国家，都习惯于凭经验去看待世界，如果中国崛起为世界最强国，她就会试图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喜好去塑造世界。因此，认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实在有些过时，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可能也会产生无比深远的影响。中国未来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将可与20世纪的美国媲美，甚至有可能会超越美国。

这给我们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从长远来看，中国是否会像现在这样接受国际体系，还是会试图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体系？目前我们还无法对此做出任何肯定的回答，因为中国仍处在崛起的早期阶段。自1978年以来，中国逐步成为国际共同体中守规矩的一员，她付出了诸多努力，向西方国家证明自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负责任的大国”。极具影响力的美国国际关系专家约翰?埃肯伯里（John Ikenberry）提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二战’后的西方秩序是独一无二的。任何一种由一个强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都是恩威并用，既有自愿随从也有被迫无奈，但是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却独具特色，比起帝国，它更加注重道德的力量，而且易于被人们理解和接受，其合法性更强，也更持久。其规则和机构体系都扎根于全球范围内*和资本主义的日益强大，后者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前者的完善。随着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的加入，它日益膨胀。它可能产生高速的经济增长，也可能发出限制增长的信号，总之，所有这些特征使得进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很容易，推翻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却很难。”

埃肯伯里认为，当前美国创造的国际秩序，拥有吸纳中国并使之成为其中一员的潜力，从长远来看，它也不会被中国领导的国际秩序替代。这是考量中国崛起之意义的关键晴雨表。迄今为止，任何一个新的全球霸权力量的出现，都会导致国际秩序的重大转变，英国和美国的情形都是如此。关于中国，人们很容易接受一种看法，即中国的崛起最终将预示着一种全新的国际秩序的诞生。这是我将在本书末尾重新回归的问题。

第一部分 导读（1）

1800年的东方和西方，究竟谁更拥有经济优势？为什么东方又很快落后于西方世界？是必然因素还是偶然因素？欧洲的优势地位是如何形成的？塑造我们世界的欧洲现代性和美国现代性有什么不同？中国现代性的形成将具备什么样的特色？中国当前经济突飞猛进的基因

源于1800年之后的近代？未来的世界，全球的主导力量是中国还是西方？

对东方来说，日本是个另类，它总在标榜自己的独树一帜，它总想着脱亚入欧、入美；对西方来说，日本也是个另类，从明治维新到向西方全面转变，它总是不遗余力，但无论如何，它也摆脱不了东方的特质。日本——究竟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

中国从1300年之后开始步入了衰退期？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为什么无法延承下去？中国未能实现工业革命，究竟有多么可惜？中国改良运动的失败源于中国人对西方越来越强烈的恨意？1949年，中国终于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进行了一次辉煌的改写历程。

西方对现代性的垄断将随着东亚的崛起而被彻底击破。究竟是东方西方化，还是西方东方化？文化的差异有多么根深蒂固？语言、服饰、饮食、政治权力，西化的成分有多少？中国现代性的出现，很快剥离了西方国家的中心位置，并使其处于相对弱势的境地。这就是为什么说中国的崛起将会带来如此深远影响的原因。

到18世纪下半叶，人类生活本质上没有太大改观，当下的生活仅仅被视为过去的翻版。同样，人们认为未来并非变幻莫测，只不过是历史的重演或再造而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陆地上，陆地上的变迁着实缓慢，因而人们对历史的经验深信不疑。物质环境和日常经验深化了人们复制和崇拜历史的哲学和宗教信仰。从日常生活、艺术、宗教和文学中传承下来的是经验、智慧、身份等级以及传统。只要变化不威胁到这些宝贵的历史遗产，它便是可以接受和合法的。即使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欧洲两大重要历史事件，从字面上看，代表的也是对于过去的怀念，哪怕它们事实上承载着许多有前瞻性的新奇内容。比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认为，尽管他们致力于改变人们看待历史的方式，但是人们对历史经典的热情也被重新点燃。从16世纪开始，这种回顾历史的思维方式开始拓展，不仅在欧洲，在中国、印度、日本和*世界也都有所体现，只是这个变化过程在欧洲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科学知识的日渐增长，科学方法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世俗主义的传播以及商业活动的日益普及，让人们开始质疑这样一种观点，即“现在和未来只不过是历史的重演”。

18世纪晚期，随着现代性的到来，一种完全不同的观点开始深入人心。现在的生活已不同于以往，未来也会更加丰富多彩。改变成为历史范式中的变量，它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权力和承诺，并被作为开创一个前所未有的未来的手段。进步、变化、现代化、原因、启示、发展和解放等一系列新词和概念，成为“现代性”内在价值观的代名词。这种态度同诸如传统、习俗、遗产、经验、保守等陈旧的思维方式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冲突，现代性—传统的划分，变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

现代性的来临不是一个历史阶段，不是某个国王的统治，或者某个朝代，再或者一场战争，或者工业革命。它的起始时间不是某个具体时间点而是某段时期；它似乎并没有确切的终点而更像是一个永不停歇的过程。工业化标志着现代性的到来和传播，现代性更像一个不断扩展的天地万物，坚持不懈地向前推进。

第一部分 导读（2）

戈兰?瑟伯恩（Gran Therborn）认为，现代性标志着面向未来的新纪元的到来。克里斯托弗?贝利（Christopher Bayly）则认为，现代性是一个不断发展、无穷无尽的过程，“从18世纪末叶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如果现代性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还是一个新颖的事物，那么现在它已经变成了引人注目的万能故事，横扫了前方的一切障碍，以其“新颖”魔力般地激发大众的想象力，影响遍布从北美到欧洲、从中国到日本的诸多地区。现代社会诸多冲突无非都是“激进”与“保守”或“传统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些冲突的程度凸显了现代性与社会血液的融合度。

对于现代性来说，其决定性时刻仍然是经济腾飞和工业化的来临。在这一时刻，新的思维方式——定位于变化和不确定性，认为未来将不同于过去，从影响小部分精英扩展到改变全人类的心态。经济活动的重心从田地转移到工厂，人类居住的中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人类生活的各方面都逐步发生了转变：生活标准、家庭结构、工作条件、知识技能、自组织、政治倾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时间观念以及对人类存在的看法。如同现代性本身，工业革命作为现代性的主要驱动力，引发了一场经久不衰的经济变革。

即使有人能将欧洲的现代起源追溯至16世纪，其变革的决定性时刻也毫无疑问地发生在19世纪，当时工业化进程横扫所有的西北欧国家，欧洲国家的经济实力大为提升，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诞生，实际上整个世界都被带入了一个由欧洲主导的全球体系中。所有这些趋势的融合，标志着人类组织发生了质变。从那时起，现代性的影响力开始遍及全球，人们追求现代性的欲望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并认为自己是现代的——从服饰和命名方式，到怀表、雨伞等个人物品——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欧洲和北美，甚至连亚洲和非洲国家的精英群体也深受影响，当然，普通民众所受影响不大（日本除外）。

从那时到现在，现代性进程的速度一直在加快。依照过去的标准，1780~1840年的英国工业革命，速度已经相当惊人；但是对比后来的例子尤其是亚洲四小龙的发展速度来评价的话，它其实极其缓慢。相继发生的每一次经济腾飞，其速度都是越来越快，伴随着现代性进程的城市化过程和农业就业机会的急剧减少的速度也在不断地加快。尽管在人们关于后现代性的争论中，欧洲表达了自己对于现代性的疑虑，但是从全球视角来看，现代性进程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席卷了整个亚洲大陆，那是世界上60%人口的家园——对现代性的看似永无止境的追求，仍然是我们当今时代的支配力量，实际上，这种追求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相比，欧洲对未来的信心和信念可能不那么明朗，但是美国却依然在慌忙地致力于探索进步和未来，如果有人想了解“拥抱未来”在实践中的真意，那么最好的地方莫过于中国。

欧洲是现代性的诞生地。1750年之后的两个多世纪里，欧洲现代性的触角已延伸到世界各地，它的思想、体制、价值观、宗教、语言、意识形态、习俗和军队，给世界其他地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现代性和欧洲是不可分割的，彼此已经融为一体，难以想象没有对方的情形：它们似乎是一对同义词。然而，尽管现代性孕育于欧洲，却没有沾染上欧洲的内在特性：除了在这里诞生，它同欧洲以及欧洲文化之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联系。过去半个世纪中，随着现代性在东亚国家的扎根，它吸取了欧洲现代性（确切地说应该是西方现代性）的经验。然而，东亚现代性并非欧洲现代性的简单翻版，它极具特色，其体制、习俗、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都是根植于自己的历史

和文化。在第一部分，我将探讨现代性是如何与欧洲（广泛地说是西方）建立起不可磨灭的联系，而东亚国家又正在如何突破这种联系。

第一章 西方的兴起（1）

“美国成功地创建了一种世界体系，它是当之无愧的霸权国，同时也秉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苏联解体之后，这种体系发展得愈加成熟，中国也逐步参与了进来。”

到19世纪中叶，尤其是1839~1842年鸦片战争中英国入侵中国的事实，生动地说明欧洲对东亚国家的优势已经明显确立。但是这种优势是何时开始的？人们会忍不住追溯到更早的时期。持这种想法，部分原因在于明朝之后——特别是产生多项发明创造的宋朝灭亡之后，中国在创新方面越来越不尽如人意。对于清朝，历史学家大卫?兰德斯（D*id Landes）认为：“在科技领域，中国变得越来越迟钝，它故步自封，无意创新。”所以，他认为：“于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欧洲将中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一方面，与过去的辉煌历史相比，中国对自己的现状感到失望；另一方面，同时期的欧洲却正在活力四射地稳步增长。大约从1400年开始，部分欧洲地区就开始显示出稳步的经济增长趋势，同时文艺复兴的酝酿为后来的科学和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不过从更长期的角度来看，这些发展的意义可能被所谓的“后见之明”夸大了：当时人们都认为，由于欧洲19世纪初叶就获得了一系列耀眼的成功和超级统治地位，所以它的成功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其实不然。于是，出现了一种并不流行的认识，有些人认为欧洲获得对中国的领先地位以及中国自身的衰落，都比实际情况发生得更早一些。

认为1800年欧洲轻松地领先于中国和日本的观点，日益受到历史学家们的质疑。杉原薰（Kaoru Sugihara）提出，1600年后的东亚并没有走向衰落，相反在后来300年的时间里，还出现了劳动密集型、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增长，被称做“东亚奇迹”——他称之为“勤劳革命”，这种经济成就完全可以与后来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欧洲奇迹”相媲美。他指出，1868年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农业表现出很强的创新能力，农作物的重大改良和生产力的大幅提高，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了支持。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的，18世纪晚期，中国的市场显然比欧洲的更加先进和成熟。例如，中国粮食产量中被远距离运输到市场上的比例远高于欧洲。中国市场在早期之所以能获得发展，一个关键原因

在于土地可以买卖。中世纪的欧洲，农奴都被束缚在土地上，既不能离开也不能任意处置土地；而中国农民只要拥有足够的资金，就能够自由合法地买卖土地及其农作物。

1800年，中国城市化的程度至少与欧洲旗鼓相当，据估测，18世纪的日本，约有22%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而西欧为10%~15%。1800年之前，无论从资本存量还是经济机构的角度来看，西欧都未享有超过中国和日本的绝对优势，当时许多中国公司都是股份制的。即使在技术水平方面，欧洲和中国看似差不多，但是在灌溉、纺织织造、染色工艺、医药和瓷器制造等领域，欧洲还是落后于中国。中国很久以前就使用纺织机器，它们与多轴纺织机和飞梭只存在细微差别，后者曾为英国以纺织业为首的工业革命提供过动力。中国很早就对蒸汽机不陌生，而且还创造出类似的各种类型的机器；只是与后来詹姆斯?瓦特的发明相比，这些机器是用*驱动飞轮，而不是相反。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英国的工业革命一开始，对资本密集型和能源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就快速提升了生产力水平，创造出一系列技术、革新和增长，这也使得英国能在科学技术方面获得不断进步，并尽享领先于中国的优势。中国则正好相反，事实证明其“勤劳革命”并没有拉开工业革命的序幕。

第一章 西方的兴起（2）

1800年，在中国和西欧的一些中心地区，生活水平是大致相当的，可能日本略高一点，人均寿命和卡路里摄入量也基本相同。人均寿命是衡量繁荣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除了最富裕的地区，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人均寿命都到19世纪末叶才超过中国。保尔?贝罗什（Paul Bairoch）计算得出，180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领先于西欧，亚洲作为一个整体落后于西欧，但超过了欧洲。当然，提起中国和欧洲，我们必须牢记一点，这两个地方都聚集了众多人口：1820年，中国人口多达亿，西欧人口达到亿，欧洲总人口达到亿。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必然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互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们普遍认为18世纪末叶，中国最发达的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已或多或少与英国等西北欧最繁荣的国家处于同等发达水平。鉴于最发达地区在工业腾飞中所起的先导作用，需要对英国和长江三角洲做出具体的比较。

1800年，西欧远没有取得遥遥领先于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地位，事实上，当时经济水平并无多大差距。从这个角度来看，认为工业化是一个持续了几百年而非几十年的历史变化过程的产物，不禁令人怀疑。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工业化看上去更像是相对偶然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这仍然遗漏了一个问题：1800年左右，为什么是欧洲而非日本和中国，能够如此迅速地把财富聚积起来，然后在19世纪取得如此令人赞叹的成就呢?

在此，重要的并不是所谓的“唯一原因”，偶然因素才是关键。1800年左右，包括中国和欧洲在内的旧世界中人口最密集的地区，都发现保持人口增长是一件越来越困难的事情，根本问题在于，粮食、燃料和建筑都在竞相争夺日益稀少的土地和森林。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尤其严重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心脏地带位于黄河和长江之间，由于土壤肥沃，该地区孕育了众多人口，但是由于资源的过度使用，这片土地日益枯竭，再加上新开垦的土地质量不高，所以问题日益突出。欧洲——具体地说是英国，之所以能够避开中国的问题，打破这种致命的土地限制，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英国发现了大量的煤炭资源，这有助于缓解木材日益短缺的困境，而且为工业革命提供了燃

料。相比之下，中国的煤炭主要蕴藏在距离人口中心区较远的地方，尤其是西北部，而非纺织工业集中地和长江下游流域。

其二，更为重要的是，新世界殖民地——尤其是加勒比和中美洲地区，幅员辽阔，劳动力充足，食物和原材料丰富：以曼彻斯特的早期经济增长为例，如果没有奴隶种植园大量便宜的棉花供应，这种增长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英国没有从新世界进口棉花，而是靠养羊产羊毛来生产纺纱，那么就需要广大的牧地（1815年约为900万英亩，1830年则超过了2 300万英亩）。总之，据估计1830年，为满足英国的进口需要，新世界国家种植棉花、蔗糖和木材所需的土地面积，大约在2 500万~3 000万英亩之间，这甚至超过了英国所有耕地面积和牧场面积的总和。在这样的背景下，殖民地所发挥的作用提醒着人们，欧洲工业化绝非一个内源性过程。新世界和在英国发现的大量煤炭资源，减轻了对土地日益增长的压力，消除了欧洲经济发展的瓶颈。中国则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因而，其影响是深远的，正如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所说："英格兰避免了变得像长江三角洲一样，二者看起来如此不同，以至于现在很难发现它们还有什么相同点。"

在关键时刻，新世界殖民地为英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原材料，这纯属偶然，但是在过去的200多年里，英国使新世界殖民化的方式却不是偶然的。殖民地也让欧洲在其他许多方面长期受益匪浅。对殖民地的争夺，欧洲内部的大大小小的战争，加上它们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欧洲民族国家被磨炼成了名副其实的战斗机器。因而，19世纪，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欧洲民族国家具有更雄厚的军事实力，其殖民扩张的野心日益膨胀。大规模的军事开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在海军上将纳尔逊（Nelson）指挥的1805年特拉法尔加海战（the Battle of Trafalgar）中，皇家海军的胜利，付出的代价相当于5个亚伯拉罕?克劳利钢厂——英国工业革命的一个大规模投资项目。殖民地贸易还为公司组织和融资系统的创新提供了支持，以荷兰为例，它创设联合股份公司，便是为了这一目的。没有奴隶贸易和殖民统治，欧洲不可能取得这样的突破性成就。

诚然，从1644年到18世纪末叶，中国的疆域也在扩大，但是这些地域处于欧亚大陆的内部，既没有幅员辽阔的土地，也没有众多的人口，不能像新世界那样提供丰富的原材料。东南亚资源富硕，本应该是在中国的新世界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最佳选择。15世纪初叶，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乘坐的船只之庞大要远远胜于当时欧洲建造的船只，这表明中国并不缺乏技术能力和财力，但是中国对待海外利益和财富的态度，与欧洲国家极为不同。尽管大量的中国人移民到东南亚，但是与欧洲不同，中国无意为被其臣服之地提供军事和政治支持，相反清王朝非常关注中国北部和西部的内陆地区，这些都反映出一个事实，中国认为自己是大陆文明而非海洋文明。

这引发了一个更为广泛的问题，就是欧洲和中国，以及两国①的精英分子，其态度到底存在何种程度上的差异，最终使得中国没能取得欧洲那样的突破性成果。中国的国力当然不是问题，我们在第3章将会看到，中国一旦把经济和自然资源利用起来，就完全具备创建丰功伟业的能力。高度发达的粮食仓储系统、长达1 794公里的京杭大运河、疆域政策，都表现出清政府强有力的治理能力。清政府在远途运输大宗物品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完全有能力胜任。但是，中国优先考虑的不是煤炭，而是粮食、盐巴、铜矿，因为这些物资对于维

护国家稳定和团结、维持百姓生活是至关重要的，它们始终是政府最为关注的层面。

实际上，这里存在一个显著的差异：政府往往把重点放在维持秩序和均衡发展方面，对商业行为和工业化进程关注较少。政府极力避免收入的巨大分化，把奢靡的行为看成有损于儒家倡导的和谐价值观的表现。这并不是说政府禁止市场活动和商业行为，而是说它大力支持农业发展。但是，除了那些从事盐业和外贸等垄断活动的商人能从中享受到一些好处，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没有起到促进商业资本主义的作用。相反，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对新兴产业更为支持。同样地，清政府不允许各省之间展开竞争，认为那样显然会造成不稳定的局面，而在欧洲，这种竞争已经转化为民族国家之间的对抗。导致中国和西欧国家心态不同的主要原因是：在欧洲，随着商业阶层的扩大，它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逐步步入欧洲统治阶层；而在中国，商业阶层一直难以进入统治阶层。商人没有根基，主要依靠政府资助和扶持来保护和促进大型商业企业的发展。西欧国家，首先以英国为例，更倾向于以工业发展为导向；而在中国，行政阶层和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仍然占主导地位。

第一章 西方的兴起（4）

因此，1800年英国相对于中国来说拥有两大长期优势并非偶然。英国（其他欧洲国家或多或少有一些）比中国更倾向于工业化，而且殖民地和此起彼伏的欧洲内战为西欧提供了丰富的战略资产，尤其在原材料和军事能力方面。但是，殖民地化为18世纪末叶的英国解决了日益严峻的土地和原材料短缺问题却纯属偶然。因此，关键点仍然在于1800年的中国（还有日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与西欧非常相似的经济地位，也拥有实现经济腾飞的类似潜力。两者之间的决定性区别是那些偶然因素——新世界国家的资源、相对充足的煤炭供应使英国资源受限较小、英国政府对工业化的支持态度。中国未能拥有这些偶然因素，结果发现自己深陷困境，而且以鸦片战争为开端，随着欧洲列强尤其是英国的入侵，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所处的局势严重恶化。历史的结局难以预料：1850年的中国和1750年一样，还是农业社会，而到1950年，农业经济水平甚至有所下滑。据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估计，中国1820年的GDP是2 286亿美元——几乎是1600年的4倍——但是到1913年时仅微升至2 413亿美元，几乎没有什么增长，而到1950年时，却下降至2 399亿美元。

如果说中国1800~1949年的灾难性遭遇发轫于1600年前后，而不是1800年前后，那么中国当前经济活力的先兆并没有消逝在久远的历史长河中，而是恰恰相反，它始终存在于近代的社会进程中。这使得中国自1978年以来所取得的巨大的经济变革的成就更有据可查。1800年的中国经济绝对不是一无是处，相反它在各个方面都展示出了非凡的活力；中国社会依然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农民体现出强劲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商人拥有极强的商业敏锐性。在列强入侵的年代，这种特征可能相对处于休眠的状态，1978年以后，它们再次登上中国社会的舞台。为此，我们得出一个更深层次的当代观点。1800年，全球经济并不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实际上它呈现出多中心的特征，亚洲、欧洲和美洲共享着全球的经济力量，其中中国和印度是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目前，全球经济重新变得日益多极化。不要认为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相反我们应该看到，过去200年里经济力量集中在欧洲和北美等少数国家手中，是一种历史脱轨的非正常情况。而且，殖民地化

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通过提供一些先决条件，使欧洲获得了普罗米修斯式经济增长，同时还赋予欧洲抑制和扭曲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发展长达100多年的力量和机会。

是先决条件还是特征?

对于18世纪末叶来说，如果西欧拥有与中国非常类似的地位，那么对于我们了解那段历史和随后发生的事件，将具有深远的意义。欧洲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与相对短期的因素有关，并非漫长的几个世纪的渐变所预先注定。换句话说，我们需要重新思索欧洲数个世纪以来所获得的、经济腾飞前夕所具备的整体特征，即人们通常假定的经济腾飞的先决条件。它们也许是可行的，也可能是有利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些条件，经济腾飞真的只是一个幻想吗？日本、中国和印度并不是没有取得类似的经济突破，但是它们的政治和文化历史完全不同于欧洲。如果最终的结果是它们获胜、欧洲失败，那么它们后来发展道路的特征，以及它们孕育的机制和价值观，肯定与欧洲的大不一样。的确，正如我们在后文中看到的，这些国家在实现现代性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与欧洲范本之间存在极为显著的差异。

第一章 西方的兴起（5）

第一章 西方的兴起（6）

欧洲例外论

欧洲远不是现代性的范本，也不是后来的每一次变革应该遵循的榜样，更不是衡量其他国家现代性的标准，尽管在实现现代性的问题上，欧洲是当之无愧的先行者，但是欧洲的经验应该被看成是特殊的。不过，在现实生活中，欧洲对自身的看法与别人对它的看法很相似，认为它是一个普遍模式。这并不奇怪。长达200多年的超级全球霸权，使欧洲原本独有的特征也具备了一定的普遍性。那么，在欧洲实现现代性的道路中，到底存在哪些独特的特点呢?

尽管欧洲国家在内战中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16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在实现现代性的过程中几乎没有遭到外敌入侵，只有奥斯曼帝国曾入侵欧洲东南部，但是到17世纪，奥斯曼帝国已被步步击退，到19世纪，它最终失去了巴尔干地区。唯有欧洲才享有这种特权。后来的现代性追求者——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都面临和遭受过现代欧洲国家的入侵。甚至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北美的欧洲移民也纷纷反对英国殖民当局，建立主权国家，以便为经济腾飞创造条件。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欧洲很久以来很少设身处地为其他国家着想，只会考虑自己的利益，尤其在殖民地方面更是如此。直到最近，这种情形才开始相对有所变化。

事实上，欧洲的殖民历史，是欧洲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更深层次特征。从16世纪到20世纪30年代，欧洲国家通过实行大规模扩张和征服，非同寻常地（另外的唯一一个国家是日本）打造了巨大的海上帝国，其触角延伸至世界各地。殖民地，尤其是那些新世界国家，以及印度和马来半岛国家，都成为列强们丰富资源和巨额财富的源泉。就像我们所看到的，没有它们，欧洲就不可能以那样的方式实现经济腾飞。除了1868年以后的日本，没有哪个非西方国家在19世纪实现腾飞，结果，大部分国家都变成了欧洲列强的殖民地。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要达成现代性，就必须经历一个从农业社会发展为工业社会，然后再过渡到服务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但是我们找到了欧洲例外论的另一个例子。欧洲国家（共16个）——英国、比利时和德国依次处于领先地位，它们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个经历过特殊发

展阶段的国家，该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工业就业人数多于农业人口和服务业就业人口。1911年，英国的工业就业人数达到了顶峰，占当时总劳动人口的，相比之下，美国1967年高峰期时的工业就业人数所占比例为，日本1973年达到了。工业社会让现代欧洲具有很多最鲜明的特征，尤其是阶级冲突的集中性和工会的重要性。从全球范围来看，在就业方面出现了一条与欧洲不同但更为常见的道路，即不经过工业阶段，直接从农业社会转变为服务业社会，目前美国、加拿大、日本和韩国走的就是这条道路。

用以往经济变革的标准来衡量，欧洲实现工业化的速度非常迅猛，但与后来实现腾飞的国家（包括美国）尤其是东亚国家相比，其进展就显得很缓慢了。西欧转型历史弥久，毕竟，英国经历了两个多世纪才具备了今天的面貌。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是，西欧国家的现代性与其传统之间的冲突一直相对比较缓和。欧洲城市完美地将现代性与传统结合起来：它像是一种地质遗迹，又像是一个新老建筑物共存的时代，还像是一个拥有数百年历史的博物馆；相比之下，北美的城市都是新建的，东亚国家更甚，在东京、首尔、新加坡、上海、吉隆坡和中国香港等城市，几乎找不到历史的印记。

第一章 西方的兴起（7）

欧洲的另一个独特特征，就是一连串的欧洲内战。也许这种现象可部分地归结于外部威胁的相对缺少，它意味着主要的断层线发生在欧洲内部，而不是发生在欧洲与外部（包括殖民地社会）之间。这些内战最初是由宗教冲突导致的，发端于1054年东部基督教与西部基督教之间的斗争，1517年后，由于天主教与基督教之间划清了界限，使整个欧洲以南北轴线为中线分裂开来。持久的宗教冲突，使得神学和后来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认识转变成强烈的理论学说。这种特征在欧洲最为显著，例如，几乎每一个重大的“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共和主义、君主主义、新教主义、法西斯主义，都源于欧洲。

从16世纪40年代到17世纪90年代，欧洲内战主要关乎早期现代国家的巩固和加强。法国大革命之后，阶级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从19世纪早期到20世纪晚期，阶级成为欧洲政治和社会的诠释语言，这在世界其他地方是绝无仅有的。从1792年到1870年左右，民族国家的建立在欧洲内战中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到19世纪末叶，这些民族国家已经发展到在全球尤其是非洲争夺殖民地的阶段，并由此导致了“一战”的爆发。“二战”也是源于欧洲内战，尽管战争中心仍然在欧洲，但是战火很快蔓延至全世界。对内战的嗜好在冷战中也得到了体现：意识形态将冷战的世界划分成两部分，当时的两大主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相互围攻。最终，事实证明对于欧洲来说，渴望内战是几近致命的：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国家的损耗极大，普遍被战争折磨得精疲力竭，其全球力量也基本上成为强弩之末。

最后，个人主义也是欧洲转型过程中的一大特点。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对个人主义进行了这样的描述：“社会是由自主、平等的单位也即独立的个人构成的，最终，这些个体比任何较大的团体都更为重要。”这与东亚和南亚文化存在着极大的差别，后者认为，集体而非个人处于中心的位置。以家庭为例，英国的家庭制度可以追溯到13世纪，通过朝圣者的传播，它奠定了北美家庭制度的基础。这种强调核心家庭的个人主义体制，与中国和印度的大户人家、包办婚姻、血缘关系维系的传统家庭体系形成了鲜明对

比。后者所持的价值观及其特征，一直持续到今天，没有随着城市化和家庭规模的缩小而有所改变。所以，在西方社会，婚姻本质上是两个个体的结合；而在中国和印度文化里，婚姻是两个家庭的结合。

在实现现代性的过程中，欧洲面对的是极为特殊的形式：外部威胁的相对缺乏、殖*义、工业优势、相对缓慢的增长、欧洲内战和个人主义。因此，我们不应该感到奇怪，欧洲的现代性比人们通常接受的更具特色。但是，因为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力如此巨大，以至于人们很难对特殊性和普遍性做出区分。不足为奇，欧洲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必须得到推广，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及和应用，必要时甚至不惜使用武力。只有随着一系列新型现代性的兴起，才有可能对欧洲经验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做出区分。

欧洲的优势

19世纪初叶，西欧和北美海岸国家的人均GDP大约是南亚国家的2倍，相当于日本、中国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的水平。到1900年，西欧和北美海岸国家的人均收入至少是中国的10倍。18世纪后期，无法克服的经济限制让中国付出了无比沉重的代价，与此相反，欧洲正处于强劲的发展势头中，到处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欧洲转型的关键是工业革命。1800年以前，英国的经济蒸蒸日上；到19世纪下半叶，许多欧洲国家都取得了类似英国的长足进步。先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像冰川移动般缓慢，现在西欧的复合增长率则远远超过了除美国以外的其他所有国家。除了北美、旧白人殖民地和1868年以后的日本，19世纪的欧洲享有或多或少的工业化垄断地位，这种情形给其他国家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章 西方的兴起（8）

欧洲与其他国家拉开的经济差距，大大增强了其称霸世界的能力。殖民时代原本兴起于17世纪，但是自18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对印度的逐步占领，殖民时代迅速膨胀起来。凭借基督教、文明、种族优越论的幌子以及举世无双的陆军和海军，英法领导的欧洲国家征服了世界大部分国家，其综合实力在1914年之前对非洲争夺战的几十年中达到顶峰。白人国家和中国、印度、北美、澳大拉西亚、南非等非白人国家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战争，后者通过战争表明了自己的最终立场：反对欧洲殖民者对其宗教和统治者的攻击，以及对他们土地和资源的掠夺。尼尔?弗格森写道：

“西方霸权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非对称性现象之一。总的来说，所有西方帝国——美国、比利时、英国、荷兰、法国、德国、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大都市仅占世界总面积的7%，人口也仅占世界总人口的18%，但是它们的领土却占全球总版图的37%，财富占全人类总财富的28%。” 如果我们将俄罗斯也看成扩展到亚洲的另一个欧洲帝国，那么西方帝国占世界土地总面积和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一半。”

作为世界的主导力量，英国试图根据自身的利益塑造全新的全球贸易体系。它主要通过大量出口制造业产品和以最低的价格进口食品和原材料来获取财富。自由主义并不只是一个抽象的原则和无私的政策。通过这种方式，英国希望利用自己在制造业方面的压倒性优势，阻止其他国家通过收取关税以保护本国新兴产业的发展。英国倡导的国际自由贸易制度，对除西北欧和北美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都产生了抑制性影响。殖民地世界的工业发展，多是极其缓慢的，或者根本不存在，因为欧洲列强一直都设法先发制人地保护本国生产者，阻止竞争者的出现。“无论殖民者的言论是多么冠冕堂皇”，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认为，“殖民地和非正式附庸国，都旨在为殖民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补充，而不是充当其竞争者。”

城市人口是工业化程度的一个主要衡量标准，1900年亚洲和北美的英法殖民地人口，仍然维持在总人口的10%左右，这与19世纪的前殖民地时期几乎没有什么不同，那时人们的生活水平甚至比1900年还要高。印度——英国最重要的殖民地（18世纪中叶处于东印度公司的

殖民统治之下，1857年被英国正式占领），1700年的人均GDP为550美元，1820年降为533美元，1870年仍然是533美元，这说明印度1870年的人均GDP低于1700年，甚至还不到1600年的水平，虽然后来在1914年升至673美元，但是到1950年又回落到619美元。在长达250年的时期内，印度大部分地区都受到英国某种形式的统治，但是印度的人均GDP仅仅增长了。而印度独立之后，人均GDP在1973年上升到了853美元，到2001年的时候，更是一路飙升到1 957美元，这与独立前的水平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1800年以后，欧洲经济腾飞不仅采用了一种规避亚洲的方式，而且有时候还综合运用经济和军事手段强制阻止亚洲国家走相同的道路。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839~1842年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向中国输入了大量产自印度的鸦片，鸦片贸易一方面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另一方面给英国和其印度殖民地带来了巨额利润。鸦片的流毒毫无疑问给中国人民的健康状况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但是在英国人眼中，“自由贸易”才是更高的原则。中国无力阻止西方打开中国的大门，清王朝日益衰落，19世纪末20世纪初，举国上下都陷入了一种极度绝望的衰弱状态之中。1900年，当欧美的远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义和团运动时，中国显然无力抵抗，其命运与非洲一样，即被列强瓜分。

第一章 西方的兴起（9）

荒谬的是，没有什么比日本的崛起更能生动地说明欧洲力量的势不可当。日本曾经面临过西方列强的入侵，也怀有唯恐遭受与中国同样命运的恐惧，但是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小心谨慎地迎来了一个快速现代性进程。它派出专家小组到欧洲学习其先进的教育体制、精锐的海军和陆军系统、发达的铁路体系和完善的邮政制度等。日本不再认定自己是亚洲的一部分，反而觊觎别国能接受它是一股西方力量。它甚至效仿西方的殖*义模式，占领朝鲜和中国部分地区。明治天皇的现代性计划，是对欧洲霸权综合特征的实践。生活在欧洲影子里的所有其他国家，无论愿不愿意，都被迫接受和效仿欧洲的部分特征，否则就会面临殖民化的威胁。

欧洲的崛起改变了其他人的游戏规则，但它带来的影响也并非完全消极：重要的是，欧洲的经历证明了工业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情况，世界也由此面临着现代性的必然选择。虽然列强们将殖民地看成满足其需求的仆人，而且绝不允许它们与主人竞争，但是这些殖民地也从主人那里延续了很多后来发展所需的基本条件。英语成为印度的通用语言，台湾地区延续了日本的教育体制，上海等通商口岸城市居民学会了西方的商业模式。但是，正如早期的经济表现以及绝大多数殖民地对外来统治的敌意所体现的，殖*义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尤其在非洲国家，其影响几乎完全是消极的。一个特例是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等白人殖民地：因为民族和种族原因，它们受到了完全不一样的待遇，所以最终获得了极其繁荣和兴旺的发展。

尽管直到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仍然设法霸占着阿比西尼亚，但是欧洲列强殖民势力最强劲时期可能是在“一战”以前。那时，美国已经开始作为欧洲列强的继任者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不仅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且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不过，这种崛起产生的所有影响，仍然被其孤立主义和对欧洲的偏爱遮掩。1850~1930年欧洲向美国的大规模移民，1900年时已占到欧洲总人口的12%，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随着帝国的迅速瓦解和急剧崩溃，中国的解放以及印度次大陆、印度尼西亚、非洲大部分地区和马来西亚

的相继独立，1945年以后的欧洲明显地走向衰落。民族国家的数量猛增了3倍。如同19世纪所发生的那样，世界地图再次被重新描绘，但是这次是以更快的速度向相反的方向转变。这些国家的独立导致了许多新的可能性，尽管事实证明这些可能性是极其分散和不对等的。前面引用的经济增长数据显示，印度的情况有所改变，但是经历奴役和殖*义之后，非洲的整体实力大大削弱。据估计，由于强行贩卖和自然死亡，非洲人口在奴隶制下减少了一半。相比之下，东亚遭受殖*义侵害的程度远低于非洲，所以处于相对有利的境况。考虑到1950年以后前殖民地出现了如此巨大的经济变革，很明显在“二战”后的头20年，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大大低估了非殖民地化和国家自由化的意义。可以说，这是20世纪头等重要的大事，它为绝大多数人变成21世纪竞技场的核心球员创造了条件。正如亚当?斯密关于欧洲人发现美洲和所谓的东印度群岛的预见性言论：

第一章 西方的兴起（10）

然而，对于东西印度群岛的本地人来说，从这些事件中获得的所有商业利益都在带给他们的巨大的灾难中烟消云散了……在发现这些地方的特殊时点，欧洲人恰好拥有如此巨大的经济和军事优势，因此，他们可以毫不受约束地侵犯这些偏远国家的利益。但之后，殖民地的本地居民也有可能会变得强大，欧洲有可能会江河日下，甚至，世界其他地方的居民有可能会获得和欧洲人一样的勇气和力量——那种能够把独立国家之间的相互侵犯转变为相互妥协和尊重的勇气和力量。

美国的崛起

美国和欧洲的现代性往往被人们一并视为唯一的西方现代性，实际上两者颇为不同。它们的联系在于1607年最先到达美国的殖民者是欧洲人。到1790年，美国共有万人，其中万人是奴隶，他们不被视为美国社会的一部分：80%的白人是英国人（剩下的20%主要是德国人和荷兰人）。一波又一波的欧洲移民带来了他们的价值观、信仰、风俗习惯、知识和文化。他们的目标是在新世界国家重新建立起一个旧世界。但是，与欧洲资本主义还保留着封建残余不同，欧洲移民不受先前存在的社会结构或风俗习惯的限制。实际上，他们可以忘记历史，一切从头开始。当然，这也使美国印第安人在所谓的“种族清洗”运动中蒙受重创。

当欧洲长期陷入土地不足的泥沼时，美国的欧洲移民根本不受土地约束，而且由于美国原住人遭到大规模屠杀，他们神话般地向西推进，领土范围不断扩大。在欧洲人拥有强烈的版图意识的地方，美国人没有形成相应的忠诚感，因为他们不需要那样做。美国如同白纸，可以随意制定规则和设计体制：从一开始，美国就沐浴在新教的春风里，美国人民被抽象原则吸引，这在宪法和后来强烈的普遍主义和全球使命意识中得到了体现。

欧洲移民带来了强有力的价值观和宗教信仰，但却抛弃了他们世代相传的阶级性，这让美国人产生了一种认同感。非洲奴隶被排除在美国主流社会之外，加上美国印第安人遭到屠杀，这让欧洲移民的身份认同打上了深深的种族烙印。无边无际的沃土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机

会，持续扩展的边界给国家灌输了一种强烈的乐观主义情绪和勇于变革的精神。美国国内市场不受当地和本地区偏好的限制，盛行于欧洲的阶级差别、地位尊卑，在美国变得平和，美国人比较容易接受。劳动力的相对稀缺，刺激人们不断地引进节省劳力的机器和提高生产力。不像欧洲，美国没有出现任何抵制机械自动化的现象。因此，美国经济对技术革新、机械化、生产的标准化、劳动过程的持续改进和规模经济的强烈渴求，远非欧洲所能及。美国模式的鲜明特色是全新的大众市场和大众消费者，以及在广告等领域随之出现的创新。所有这些事实都证明，从19世纪晚期开始，美国的资本主义远比欧洲的更具活力和创新能力。

1820年，美国仅占世界GDP的，而英国高达，德国也达到。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到1870年时，美国占世界GDP的比例已经上升到，而同期英国是，德国是。到1914年的时候，美国这一比例一路上涨为，而英国只停留在的水平，德国也只有。1950年是美国经济的全盛时期，占全球GDP的比例达到，相比之下，英国是，德国是，其他所有西方国家加起来为。

第一章 西方的兴起（11）

尽管两次世界大战带来了极大的创伤，但是1870~1950年的美国经济还是大大超过了欧洲的水平，这为1945年之后的美国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奠定了基础。美国完全逃脱了“欧洲殖民地”的命运，成为第一支真正的全球力量：美元被奉为世界货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等一系列新型全球机构也体现出美国的经济霸权，同时美国的空中军事优势更是前所未见。美国成功地创建了一种世界体系，它是当之无愧的霸权国，同时也秉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苏联解体之后，这种体系发展得愈加成熟，中国也逐步参与了进来。到了1960年（可能更早），美国已经取代欧洲成为一个令世人瞩目的典范。凭借好莱坞和电视肥皂剧，还有可口可乐和李维斯牛仔裤等消费产业的标识，美国显示出一种新的文化霸权和影响力。美国大学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最优秀的学者和学生。在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单上，美国永远名列前茅。当英语成为世界通用语言而流行于全球时，其背后隐含的是美国巨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美国已经成为现代性的一个新隐喻：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毫无负担、善于革新、拥有新边疆精神①。它诞生于当下，并且从未过时，行为准则体现在宪法中，全社会都致力于一个永不停歇的再造过程，源源不断的移民不停地改变着国家的构成和国民的身份。硅谷的兴起、人们对整容手术的嗜好、拉美裔人口日益增长的重要性，虽然体现在美国社会的不同方面，但都是美国精神的最新表现形式。美国现代性的特征与欧洲的如此不同，以至于人们将美国当成一种外来物，但是从美国确实源于欧洲的事实，又意味着两国之间的结合力和凝聚力，特别是在全球背景下，会一直都很强大，而且很可能保持下去。血统、种族、历史、文化、宗教、信仰以及共同的利益，掩盖了彼此之间深刻的分歧，“西方”一词的普遍使用已经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它意味着美欧之间的亲近，不仅仅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更重要的是它们之间的文化、种族和民族上的亲近，“西方人”一词，栩栩如生地刻画出所有这些潜藏的含义。

无论欧洲和美国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分歧，它们都会继续保留价值取向和身份的共识；的确，非西方国家及其文化的兴起，可能也有

助于增强这种相似性意识。当然，欧洲新兴少数民族的逐渐增多和美国非白人少数民族重要性的日益增长（奥巴马的当选折射出这一点），正逐渐地改变着这些社会，但是这种进程不应该被夸大。要让大西洋一岸的绝大多数白人改变主导他们的社会，还需要漫长的时间。

西方塑造了我们生活的世界，虽然现在它越来越多地受到中国的影响，但是西方国家仍然是当今世界上最具压倒性优势的主导力量。西方对世界的影响如此之深，以至于难以想象如果没有它，或者所有这些从来没有发生过，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认为西方霸权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它是如此根深蒂固和无所不在），我们不知不觉就认为它的存在是非常自然的。历史学家J?M?罗伯茨（J. M. Roberts）自信地写道："显然，西方文明的故事现在成了全人类的故事，其影响力的传播范围如此广泛，使过去那些反对者和对立者都变得黯然失色、毫无意义。"不过这也不尽然。西方霸权既不是自然的产物，也不是永恒的，相反，在某个时期它将会自行终止。

第二章 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1）

“当明治维新的目的最终达成，下一步做什么？日本没有答案，该国陷入了一种生存主义危机。人们一直习惯于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说明日本的泡沫经济，但是这里也存在着一种更深刻的文化和心理上的解释：这个国家及其机构，包括公司，完全失去了方向感。”

在东京过马路，是一种特别的体验。几乎每一条街道，哪怕它非常窄，都设有一些交通信号灯。过马路时，即使没有汽车，人们也会耐心地等候绿灯，无论男女老少都鲜有闯红灯的情况。人们都习惯了遵守交通规则。作为一个慢跑者，我发现东京的交通让我心里很纠结：密密麻麻的交通信号灯严重阻碍了我的跑步节奏，但是每次想要闯红灯，我的内心都会产生一种负罪感，所以最后都能忍住冲动，哪怕当时身边一辆车都没有，甚至一个人都没有。这是一个遵守规则的社会，这种特性会传染给身在其中的每个人。

像防晒霜和蚊香一样，在某个特定的日子，泳帽会出现在所有的超市里，过一段时间，它们又会突然消失。无论身处哪所学校或哪座城市，所有学生都穿着同样的制服，唯一的区别就是初中生和高中生的制服有所不同，一旦某件产品获得了5%~10%关键群体的认可，它便立刻像野火一样随风蔓延开来。对于90%的美国人来说，彩色电视梦想，等了20多年才实现；而在日本，却用了不到10年，1970年前后，日本的彩色电视需求呈直线上升。青少年杂志《Cawaii！》的编辑Yoshiyuki说，只要5%的小女孩喜欢某样东西，一个月内它就会得到60%的年轻人的支持。尽管日本的年轻人都非常注重打扮，但是他们的时尚潮流体现出强烈的一致性，缺乏个性。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的经济学家Sahoko Kaiji解释道：“在日本，你可以放心地把车停在大街上，即使忘了上锁，第二天早上它还依然原封不动地停在那里。你即使把立体音响放在汽车的仪表板上，把手提包放在座位上，也不会发生任何事情。”地铁上，女士们可以开心地享受旅途，哪怕她们的钱包就放在打开的手提袋的最上端，也无须担心；拥挤的汽车上，男士们可以将手机放在牛仔裤的后兜中，根本不用担心会被偷。Kaiji接着说：“日本人总是那么友善和守信。如果你在某家商店订购商品，并被告知大约需要两周的时间才有货，一旦商品

提前到达，他们一定会给你打电话，而且十有*商品会早到。”在日本，你很少能看到乱扔的垃圾，即使是在每天接待200万乘客的日本新宿车站。我印象中唯一的一次例外，便是在名古屋附近的丰桥车站，我看到地上有一张小纸片，当我对日本朋友表达我的惊讶时，他告诉我：“别担心，人们立刻就会捡起来的。”

日本人非常有礼貌。见面时，人们总是向你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并鞠躬行礼。当你来到超市或商店，门口总有人迎接。这里不存在傲慢或粗鲁的行为。无论是排队还是走出电梯，你的个人空间永远都会受到尊重。你会感觉到自己真的是那么回事儿。人们的参与意识已经深深地影响到日本的社会态度。日本著名的社会学家中根千枝（Chie Nakane）对我说：“失业不仅仅是失业者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日本是一个很重视个体的国家。在东京成田机场，身穿制服的乘务员会礼貌地示意你按秩序排队，当你正在踌躇自己到底该站在哪里时，地上涂好的脚印会打消你的疑惑。无论车站和机场有多大，你都不会迷路，因为日本人在提示方向时细心周到。在细心周到方面，还表现在日本人对准时的格外重视。在地铁站，站台指示牌不仅预报下一班地铁到站的时间，还会预报停站时间，而且地铁也非常准时，几乎与预报毫秒不差，人们可以根据日本的地铁来调准自己手表上的时间。

第二章 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2）

表面上看起来，日本与西方国家极为类似，但实际上却大不相同，套用中根千枝告诉我的一句话：“日本表面上‘很西方’，但骨子里却‘非常日本’。”

日本是唯一一个19世纪便开始工业化进程的亚洲国家，也是唯一一个顺利闯进排外性极强的西方国家俱乐部的亚洲国家。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日本在效仿西方的尝试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14年之前迅速实现工业化，1939年之前又占领了大部分东亚地区，并一直占领这些殖民地到1945年，到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其人均GDP已经领先于许多西方国家。当东亚一些发展迅速的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实现经济腾飞的时候，日本的经济模式已经很有影响力了。如果我们想了解亚洲现代化的本质，日本是最佳的研究样本，因为日本是最早实现现代化的亚洲国家，而且它现在仍然是亚洲国家中最发达的典范。不过，虽然日本是东亚地区的一部分，但这并不表明它就是这个地区的代表，相反，我们将会看到，日本在很多重要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

日本从哪里来?

日本的形成，得益于两次对当时最发达文明的融合：15~16世纪的中国，以及19~20世纪的西方。早期的日本深受邻国中国的影响，这一点不足为奇，毕竟中国当时已经是一个相当发达和成熟的国家。在吸纳中国文明之前，日本甚至没有自己的书法艺术，但是后来它吸收了很多中国元素，并将其融入自己创造的文字中。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逐渐为日本文化奠定了基石。大约6世纪左右，中国的道教、佛教和儒家思想，或多或少地经由高丽（今天的朝鲜）传入日本。道教与日本的泛神论融合成神道教，而儒家思想在日本的情形和在中国一样，变成了占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应当指出的是，儒家思想可谓是当时最先进的理念，它最伟大的成就是放宽了对人们接受教育和文化的限制，而在那之前，读书识字、学习知识的权力专属于贵族。中国对日本的影响持续了许多世纪，直到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才被日益崛起的西方影响力替代。因此，日本在中国的影子里生活了几乎长达14个世纪，这给日本民众的心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孕

育了日本国民一种潜在的自卑感，同时还夹杂着某种防御主义、早期的激进主义，以及民族主义。

尽管中国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但这些影响都是融入日本自身的经验和传统中，才形成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思想。很明显，日本儒学与中国儒学在各方面都是风格迥异的，中国儒学的核心价值观中包括仁爱之心和善行，而日本儒学则更强调忠诚。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之间的差别越发明显。忠诚和孝敬长辈——基于权威、血统和年龄，是等级关系最关键的特性，它们长期以来一直是日本文化的核心，到今天依然如此。中国和日本都受到皇族的统治，但是它们大为不同。

首先，中国可以改朝换代，中国历史上就出现过36个朝代。与此相反，日本的天皇家族被视为神圣不可冒犯的。在日本1 700年的历史记录中，一直都是一个家族盘踞天皇的宝座。其次，中国王室享有绝对权力，而日本天皇则没有。历史上只有1/3的时间——除了远古时代和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天皇家族名副其实地统治着整个国家。在其他大部分时间里，日本一直都在接受双重或三重政府的统治，天皇实际上被迫与别人一起分享权力。最典型的形式是双重政府，对政治权力的有效控制要么掌握在军事首领手中，要么就掌握在有军事力量支持的首相或首席顾问手中。换句话说，永久掌握政权的代价，就是扮演一个影响力大大减少的政治角色。

在德川时代（1603~1867年），真正的政治权力是由幕府将军控制下的军队行使的。天皇仅具有象征性和礼仪性的意义，尽管在形式上，军事首领仍然对天皇负责。露丝?本尼狄克特，在她对日本的经典研究著作《菊与刀》中发表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言论：“日本天皇的概念，是在太平洋岛屿之间反复再三才形成的。他是一个神圣的首脑，可能参加也可能不参加政府内阁的事务。在某些太平洋岛屿，他会参加，而在另外一些太平洋岛屿，他会下放自己的权力。但是他的人格总是神圣的。”换个角度来看，要了解日本，我们必须把它放在太平洋和东亚的背景下进行研究。

明治维新之前统治日本长达250年之久的德川时代，见证了一个权力高度集中和正式的封建制度的创立过程。自皇室家族和大名以下，整个社会分为四个等级，其等级制度如此森严，使当时的社会具有某种种姓的特征：四个等级分别是武士、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严格地说，部落民——即从事屠宰业、皮革业等所谓贱业者和乞丐游民，他们一直都被看成社会的隐形人，是社会中可有可无的角色，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在日本，人们的身份等级是以世袭原则加以世代传承，千百年来一成不变。每一个家族的首领，都需要在自家门道里张贴自己的阶级立场，并详细地说明自己的世袭地位。他与生俱来的权力决定了他能穿什么样的衣服，吃什么样的食物，住什么样的房子。大名每年都从农民那里收缴一定比例的粮食，除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还要给下属的武士分发一部分。武士没有土地，他们的正式职能是保卫大名及其土地和财产。他们是唯一被允许佩剑的社会成员，比起地位更低下的阶层，他们享有广泛而独断专行的权力。在德川幕府时代，大名主要对将军负责，而将军至少在形式上又要对京都的天皇负责。日本的儒家思想与中国的不同：后者尤其重视优质教育，官话便是竞争激烈的科举考试的产物；而在日本，最卓越的称谓都给了武士，幕府时代尤其赞美武士道精神。在德川时期，中国实际上是一个重视平民儒家思想的国家，而日本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重视军事儒家思想的国家。

德川家族是从17世纪初叶开始统治日本的，上台不久，他们便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切断日本与外界的联系，并*基督教，反对外国势

力对日本习俗和宗教传统的干涉。欧洲船只不许使用日本的港口，只有荷兰可以把出岛作为贸易港口。日本人被禁止建造或经营大型船只，否则要受到严惩，这些规定严重阻碍了日本沿海的贸易活动。统治者制定这些政策的原因，似乎是希望能以此来限制商业活动，同时也表现了他们对外来影响的恐惧，尤其是从欧洲进口的枪支，统治者认为它可能会动摇将军之间微妙的权力平衡。尽管这些行为让日本倒退到专制主义时代，但是德川时代也出现了很多充满活力的变化。随着语言的日益标准化，不同地区的人们的认知和生活习惯趋同，日本社会日益朝着一元化的方向发展。

总之，当时的日本已经开始具备形成现代民族国家所需的条件。新建的公路网进一步发挥了促进国家统一的作用，沿着这些交通枢纽兴起的商业区，逐步变成了充满生气的贸易中心：到德川家族统治末期，江户，也就是今天的东京，其城市规模堪与伦敦相媲美，人口也超过了100万；而当时日本其他的一些城市，例如大阪、京都、名古屋和金泽，也具备了相当规模的人口。如我们在第1章所描述的，1800年的日本经济与当时的西北欧相比，更为发达，在1868年明治维新的前夕，除了缺少一个致力于此目标的政府，日本已经完全拥有经济腾飞的条件。

第二章 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4）

最后，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一点：武士的职能和作用不断变化。虽然他们最初的目的是保卫大名，但是随着后来必须承担越来越多的管理责任，并负责保护大名的财产，以及代理主子大名与其他大名和幕府之间的谈判协商和签订议定书的事务，所以他们的地位日益重要。事实上，在明治维新前夕，他们就已经从一个军人阶层转变成日本社会里一个关键的管理阶层。尽管沉湎于儒学的管理治世思想，但是他们的认知和癖性本质上还是倾向于军事和科学技术，而不像当时的中国主要侧重于文学和学术理论，这种目标和倾向，对后明治维新时代日本的特质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明治维新

1853年，美国海军上尉佩里率领“黑船舰队”，出现在江户湾（今东京湾），粗暴地打破了日本国德川时代相对和平与稳定的局面，佩里伙同其他欧洲列强，特别是英国，要求日本打开国门进行贸易活动。日本长期实行的孤立政策，再也无法持续下去：如同19世纪其他许多国家那样，日本再也不能无视西方及其疯狂抢掠的变态行径了。1858年，面对外国的持续侵扰，日本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列强由此打开了日本的贸易之门，并对日本的主要港口实行治外法权，从而使西方列强逍遥于日本法律之外。这些不平等条约，包括治外法权，严重削弱了日本的主权。1859年，日本被迫取消已经执行了300多年的对基督教的禁令。

英国、美国、法国、荷兰等西方国家的干预，引起了日本国民的强烈反感和愤怒，国内掀起了一波巨大的排外浪潮。面对日益动荡和骚乱的局势，德川政权陷入了几近瘫痪的困境。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两年，并于1868年达到了顶峰，随后，幕府——有效统治日本的军事体制——被萨摩藩和长洲藩的联合势力推翻，天皇下诏将江户改称东京，后迁都东京。至此，以天皇为首的新政府便建立起来了。武士是德川政权倒台的发动者和新明治政权建立的主谋，后者是以1868~1912年的统治者的名字来命名的。明治政府致力于创建一个现代国家，武士为了巩固新生政权，提升新政府的威望，自己做出的牺牲就是废除陈旧的封建特权，被剥夺了随身佩剑的权力，以及以实物

付款的垄断权，改为以现金付账，至此，武士原来享有的特权大为削弱。

长达两个半世纪的德川幕府统治结束了，这个富有戏剧性的政治变化并没有受到任何政治蓝图、政治目标或政治远景的驱使。刚开始，日本国内从上到下都弥漫着浓厚的反西方情绪，但是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部分统治精英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孤立不是上策：如果日本想要从西方国家的野蛮行径中幸存下来，它就必须对西方强加的种种挑战做出回应，而不是简单地忽视它们。先前还充满仇外情绪和孤立情结的统治阶层，经历了一场彻底的政治转变，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共识，明确了自己需要做的事情，并决心迅速实施。现代君主国家创建了首席大臣辅佐天皇的制度，但是实权都集中在首席大臣手中。到1869年，婚姻和工作可以自由选择。1871年，日本的封建体制事实上已经解体了。1873年，日本颁布征兵令，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兵，彻底废止了武士随身佩剑的特权。政府立即着手建立工厂，由先前的武士负责运营，这些举措使日本迎来了一个极具特色的经济时代。

第二章 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5）

如果说早先吸收中华文明的精髓，对日本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么遭受西方威胁的亲身经历，则有力地说服了日本新的统治阶层：如果日本希望维护国家独立，不重蹈中国的覆辙，就必须尽快向西方学习，而当时刚经历了鸦片战争的中国，正在逐步丧失国家主权。明确了发展方向，日本新政府便开始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探险，在缺乏明确周详的行动方案的情况下，其行动的快速、执行目标的坚定不移，政策覆盖面的广泛性和综合性，的确令人称奇。

在这激动人心的20年里，日本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国家，迅速建立起一系列新机制。它派出特使和代表团到欧洲，甚至还到美国，研究到底应该学习什么，借用什么，吸收什么。一切都以高度系统的方式运行，其目的在于明确哪些国家在哪些特定领域能提供最多最有价值的信息和经验。恰当快速地学习和吸收西方的经验是当时日本最为紧迫的任务。日本1873年引入的教育体系，是模仿法国学区制的结果；其海军的建制，先是效仿英国海军，后来又相继借鉴了法国和德国的陆军系统才得以完成；日本修建的铁路是以英国为范例的，创立的大学则是效仿美国而成。1871~1876年，大约300名欧洲专家被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邀请到日本，协助日本进行设计和施工。其结果便是外国经验的集成（这成为日本的一大典型特色），并不知不觉地融入日本的民族特性中。

从19世纪70年代后期，政府开始低价出售新建工厂。由此，日本开创性地孕育出资产阶级。政府以发行债券等方式逐渐取消俸禄，消灭了武士阶层，他们可以用债券购买新建的工厂，而且通过这种方式取代了他们原先以实物付款的封建做法。因而，日本的资本主义业主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两个显著的特点，并且在明治维新以后，一直作为日本的标志延续至今：首先，他们能够存在，并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主要得力于日本政府的慷慨赠与和大力资助，所以背负着艰巨的责任和义务；其次，依据他们的背景、接受的训练和品性来判断，这些新兴资本家更像是管理者而非企业家。

在许多方面，明治维新所倡导的内容都是极具革命性的，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现代国家，消除封建残余。新的统治精英不是从大名当

中提拔起来的，而是主要来自武士，其中包括部分并入武士阶层的农民，还有一些商人。阶级力量显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与欧洲不同，日本的新兴阶层——商人，既不会煽动这种变化，也不会亲自挑头去促成这种变化，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并没有与陈旧的制度发生冲突。相反，明治维新的领导人，也即武士阶层，已经逐步转变为更广义上的统治阶层。为了强调历史的延续，同时也为了取得大众的支持和为新政权提供合法性，武士将天皇重新尊奉为日本民众生活中更为核心的角色，天皇迁都东京，便是一个极富象征意义的举动。与其说明治维新是日本人民自下而上的起义，还不如说它是一场自上而下精心策划的政变，它其实是一次以将日本从外国的威胁中拯救出来为名，行维护现存精英权力之实的行动。其目的在于，要努力使这场变革运动在保守主义的指导下，尽量采用非激进的、有所保留的方式进行。

第二章 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6）

日本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国家，其连续性远远强过非连续性：甚至在1868年，当非连续性成为一种必要的时候，它也没有像法国和中国那样——两国都实行了革命，最后以和解而告终。它是由怀揣着实现根本性变革的理想，但在实践过程中又尽可能保留旧秩序的精英们建立的。因此，与大多数革命相比，维新过程中的流血牺牲相对较少也就不足为奇了。统治者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保留了生活习惯、传统、习俗、家庭结构、等级关系和层级结构。明治维新证明了日本精英阶层的灵活性、实力、适应能力以及在必要的情况下改变时局的能力。

欧洲的革命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变革相比，存在一个根本性的差别。比如，除了其他的情况以外，法国大革命是对资产阶级兴起这一内部威胁的回应，而明治维新则是源于对外部威胁也即西方列强的反应。当然，这是欧洲和其他地区最根本的地缘政治差异，欧洲是领导者，因此也是奴役者，对此，其他国家必须找到一种对付欧洲列强和其扩张行径的方法，这个差异也有助于解释明治维新怎样以及为什么由一部分精英统治者而非当时正兴起的敌对团体发起。迫使日本改变局势的不是商人阶层的兴起，而是西方国家的威胁。

对历史的传承

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主动迎接现代化的国家，一种在西方强权和本国特性之间做出权衡的现代化。日本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也是该国自觉并刻意在西方化和日本化之间走钢丝的过程。然而，与后来的其他亚洲国家现代化的例子相比较，它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就是能自由地做出抉择，这一点在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后来者可能无权进行选择。因此，日本现代化是一个引人入胜的研究案例：一个国家的现存精英统治者为了保护国家的本质，对西方化做出了自愿并适当的选择。

尽管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日本几乎与世隔绝，但是在关键时刻，日本对待外国影响并非采取盲目排斥的态度，而是表现出一定的开放性和适应性，从5~6世纪日本与中华文明的关系中就可以看出这个特征。在必要的时候，愿意吸收外来影响力，已经成为日本社会的

潜在力量。断然拒绝被完全同化，希望在吸收外来影响力的同时，保持日本的“本质”或民族情绪，已经在试图界定日本作家吉野耕作（Kosaku Yoshino）所描述的“我们自己的领域”，也即传统习俗、体制和价值观的过程中得到体现。正如吉野耕作所说：

“为了坚守‘我们的领域’，人们坚守着重大的差别，不仅要区分‘我们’（日本）和‘他们’（值得借鉴的其他国家），更重要的是，要强调‘我们的领域’的存在，从而表明‘我们’的民族作为一个文化实体的连续性。这样，历史就可以延续。日本声称对‘我们’的这种文化领域保持独家所有权。”

日本的独特性可以用两种方式来分别加以界定并保留：第一，在日本独有的认知领域，保留着那些被视为具有排他性的和真正意义上的日本要素；第二，由各种各样的外国影响力和那些被视为具有日本独特性的要素结合而形成的独特产物。正如有人认为，日本的“领域”概念远不止于日本自身的“混血性”。尽管日本文化很独特，例如榻榻米、日本清酒、相扑，但是日本的特性归根结底还在于日本人为何会行为特别，也即日本人和其他国家的民众的根本的认知差异何在。这种二元性允许固有本质和外来影响力的共存，也广泛地扎根于从饮食和服装到电影和婚礼等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两者以某种方式共存，它们之间基本上少有激烈冲突，日本吸收外来影响的精髓然后加以重构，与之融合形成自己的特色。故而，日本现代性是一个相当复杂、不协调、有时候甚至有些怪异的现象。它的融合可以追溯到中国影响力时代，但是在西方化时代，这种特征表现得最为明显，日本所受的精神创伤也是最大的。这种融合是如此根深蒂固，使人们理所当然地将它看成日本最自然、最固有的特性。

第二章 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7）

经历了极端的西方化时代后，日本人和西方元素的关系，一直是人们认真思考和激烈争辩的主题。1868年后，日本经历了西方化和日本化的交替。明治维新后的头20年，日本国内许多领域迅速西方化，但是到1900年，这种现象让位于内省和寻求国家本质定位。在这场辩论中，日本国民性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界定：天皇制度、武士精神和家庭社会观念（天皇即父亲）。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失利并被美国占领后，再一次进入了疯狂追赶西方经济的西方化时期。随后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又迈向了更深层次的重新定义日本国家本质的阶段。然而，历史从来都不会故步自封，在这节骨眼上展开的日本“国民性”概念，与其在20世纪初叶的意义完全不同。20世纪70年代关于日本国民性的讨论，大多认为日本是一个以集团为主导的单一同质社会，日本国民的一致性是难以言表的、不合逻辑的。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种看法不足为奇，“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日本仍然固守着自己的“国民性”。

当然，日本国民性的本质实际上不能用如此简单的词语来描述。日本性（Nihonjinron）是针对西方影响而做出的具有政治创造性的文化回应。它让我们了解了日本人的许多心理，他们希望与众不同的愿望，但是它也只能部分地揭示出日本固守的差异性。在《菊与刀》中，露丝?本尼狄克特提出：

在研究西方国家的过程中，如果没有比较各国文化，就会对整个行为领域不得要领。研究者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没有必要去探究日常生活中的琐事，这在电视荧屏上司空见惯。殊不知，正是这些琐事决定了国家的未来，而不是外交官签署的诸多条约。

日本的独特性恰恰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人际关系的本质到引导人们行为的价值观，都很容易被人们忽视。

日本的人际关系，要遵循严格的等级制度，这种等级制度主要基于人们的阶层、性别、年龄来做出划分，每一种人际关系都可以根据以往的接触频率和熟悉程度，按照这些标准来精确地分出等级。等级制度的重要性，最初都是从家庭中习得的，父亲毫无争议地扮演一家之主的角色，每个家庭成员的地位都是注定的。家庭是整个社会的缩

影：天皇被视为国父，公司也是按照家庭的思路设想出来的。等级在语言的使用中也得到了体现，比如，表达“你”的时候，要根据对方的社会地位来选择词语。语言也是分性别的，男人和女人需要使用不同的词语和称谓。日语中有很多敬语，尤其微妙的是日本有一套严格按等级设定的鞠躬体系，鞠躬的程度取决于对方的身份地位，公司经常建议员工们根据他人的地位来确定鞠躬的程度。

日本不仅要求尊重等级制度，而且还存在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责任系统。日本存在两种类型的义务，比方说对自己父母承担的义务是无限的和终身的，而情理则是有限的。这些义务和责任构成了日本社会的核心，日本所谓的贞德是从承担义务的角度来定义的，而不像西方社会那样，通常用金钱来衡量美德。如果一个人不够担当，他会有一种羞耻感。从广义上讲，文化可以划分为（类似基督教衍生出来的）负罪文化和羞耻文化。一方面，负罪文化源于原罪的观念，即人本质上都是有罪的，它是依据事实来判断；另一方面，羞耻文化是通过站在他人的立场上审视自我，从而进行自我约束的产物。日本的耻辱文化根深蒂固：与一个人自己的良心相比，他如何被别人评价，才是最为重要的。罪恶感可以通过道歉来减轻；而羞耻感则正好相反，几乎是无法减轻的，它会导致一种非常独特的行为方式。比如，在西方社会，自杀作为一种自私的举动，被视为人所不悦的行为；而在日本，自杀却被视为敢于担当的终极方式，因此是一种崇高的行为。在日本社会，自杀现象更为常见，平均每100 000个男性中个会自杀；而美国只有个，英国只有个，德国则为个。

第二章 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8）

第二章 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9）

第二章 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10）

第三章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1）

“从1949~1978年，新中国成立的第一阶段扭转了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衰败局面，实现了先前的政权无法创造的经济腾飞，而且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中国转型的基础是在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历史证明，1949年革命完全不同于1911年辛亥革命，它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

遵从乔治三世的命令，第一个英国贸易使团于1792年9月离开英国前往中国。他们给这个遥远的封建国家带来了许多稀奇古怪的礼物，比如望远镜、钟表、晴雨表、装有弹簧悬挂装置的马车和气枪。贸易使团乘坐一艘装有66门火炮的军舰和两艘补给舰来到中国，任务是向大清乾隆皇帝展示本国工业革命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精湛技术。这个700人的使团中包括外交官、商人、军人、科学家、画家、园丁等，不论对国家还是对个人而言，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寻找机会。代表英国政府的东印度公司（实际是英国的海外公司，统治印度直到1858年），非常希望打开中国市场，但他们之前的努力都付之东流，所以本次使团出访之前进行了精心的长期准备。英国人抵达澳门后，发现葡萄牙早已在这里建立了一块基地，于是又花费4个月的时间向北航行，与清朝皇帝的代表进行了一番谈判，并左等右等，才见到他们此行最想见的人——乾隆皇帝。

1793年9月，英国公使马戛尔尼进京拜见乾隆，希望获准在通商口岸广州从事贸易，并愿意上缴关税。但乾隆不为所动，贸易使团的努力化为泡影。乾隆皇帝没有给马戛尔尼明确的答复，而是向乔治三世发布了一道敕令，称清政府没有必要扩大对外贸易，因为中国地大物博，根本不需要其他国家的东西。乾隆这样写道：

“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京一事，于天朝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

自恃拥有不断强大的国力和工业革命的早期成果，英国十分傲慢自大，但是81岁的乾隆皇帝对此却一无所知，英国人也颇为费解。遭拒后，两手空空的马戛尔尼只能通过走陆路到广州的唯一路径离开中

国。在这次航程中，他坚持作了大量的记载，其中有一条写道：“中国是一个古老、疯狂的国家，它拥有一流的军舰。那些足智多谋、谨小慎微的政府官员固守着150年来的陈旧思想，试图以自己的大国地位威慑邻国。”他对大清帝国的未来非常悲观，认为其命运注定是要“在海岸上被撕得四分五裂”。 马戛尔尼指出，中国拒绝英国的要求是没有用的，因为“遏制人类知识前进的步伐是徒劳的”。一个时代行将结束、另一个时代即将来临的看法，不仅表现在马戛尔尼的过于自信中，也表现在清朝皇帝对英国新制造技术的无知中。同时，文明的碰撞在外交礼仪争端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中国要求马戛尔尼拜见皇帝时行三跪九叩大礼，但后者却一再坚持只行脱帽礼和吻手礼，并表示如果中国官员也向乔治三世行同样的礼节，他就愿意给清朝皇帝叩头。对于中国来说，这显然是无稽之谈：皇帝是“天下”的统治者，根本不可能与一个遥远的藩王平起平坐。甚至围绕着英国带来的物品也产生了许多争论：根据有1 500多年历史的中国传统，外国只能作为朝贡国进贡，中国人认为马戛尔尼只不过是向朝廷进贡的使者，但后者却再三坚持自己应该拥有与清朝地位平等的外交使节身份，两方各不相让，就这样，处于两个时代的两种文明在未能相互理解的情况下不欢而散。

第三章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2）

贸易使团最后只能以失败而告终。马戛尔尼关于中国命运的预测也许是中国人无法想象的，但是当时实力不断增强而且富有侵略动机的英国显然已发出了某些暗示。马戛尔尼出使北京的时候，东印度公司已经开始从印度贩卖鸦片到中国，这个行当很快就被证明一本万利。1829年，中国明令禁止鸦片，英国对此大为恼火。随着两国关系渐趋恶化，英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年），凭借大炮让中国的南方城市屈服。在《南京条约》中，清政府被迫割让香港岛，而且还首次开放了5个通商口岸并支付大量赔款。中国 “屈辱的世纪”从此开始。

如果说日本是19世纪开始工业化进程的唯一东方国家，那么中国就是最好的反面教材：即便1800年时它仍与日本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但后来却没有踏上工业化的道路。结果，19世纪的中国被当时的欧洲和美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随后又被日本超越。1800年以后——特别是19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经济日渐衰弱、几近崩溃，整个国家承受着分裂、失败和被外国列强瓜分的屈辱，主权大量沦丧。1949年以后，中国开始出现转折，特别是1978年后更是出现了巨大的转变。但是，中国现代性的动力来自历史而非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尽管当时没有出现这样的迹象，但现代性的过程肯定不是简单的“屈辱的世纪”就能解释的。不过，这一时期的确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创伤。跟日本一样，中国的现代性之路与西方所走的道路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别。

辉煌的世纪

耶稣诞生前数年，中国就已经出现了现代的雏形：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的胜利，标志着战国时期的结束和秦朝的开始。截至公元前206年，秦朝的边界广阔无垠，我们所认为的当今中国心脏地带的大部分地区都包括在内，其中还包括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之间人口密集的区域，向南延伸至越南南部，向北扩展到长城以北。可以毫不夸张地认为，现代中国诞生于公元前221年。秦朝的衰亡之后，汉朝的边界继续迅速扩展，并于公元前141~公元前87年，实现了领土扩张的最高峰，东北至朝鲜半岛，南至中国南部和西南部，以及越南北部。在后来的1 000年里，中国的领土范围向北、东北和西北，向南和西南，均

有所扩展。中国稳步获取的庞大规模，与其大陆地块的自然边界有关，北至西伯利亚大草原，其海岸线至南部和东部地区，丘陵地区延伸至东南部。

大规模的内部迁徙、交通设施的不断完善和长达几个世纪的国家统一（或大体上统一）状态，有助于大量分散的人口创建一种相对同质的文化。秦朝——虽然其寿命可能算不上长久，但是它建造了6 400多公里的交通要道，这是可以与罗马帝国相媲美的一大丰功伟绩。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一种成熟的治国方略，深深扎根于孔子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对2 000年来的中国政治和道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秦始皇的统治下，书同文、车同辙、度量衡、货币都实现了统一。中国的独特习俗——知天命尽人事的思想、依靠恪守孝道形成的家庭结构、使用共同符号和象征的语言、基于崇拜先祖观念的宗教，在这个时代都已经确立起来了。在第一个千年里，中国基本上拥有——考虑到它实际上已经融合了多民族的事实——一种了不起的文化同质性。

第三章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3）

中国历史上一直都存在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尽管它遭受了来自北方族群的多次入侵，尤其是13世纪的蒙古族和17世纪的满族，但是所有这些入侵者，一旦统治得到稳固，便试图学习汉族人的习俗和价值观，并且按照中原人的原则和制度来进行统治，这都证明了汉族人当时所享有的声誉和威望。汉语的坚持不懈和稳步传播是文化力量的一种象征：虽然遭受北方持续不断的入侵，但居民的迁徙，避免了汉语分化成不同的方言，同时让中国人自己更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从而也更加保护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像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那样，早期出现的中国国民特性，对于中国来说，可能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为关键，因为如果没有这种特性的话，中国就不可能保持超过2 000年之久的统一，同时其规模多少也会遭到削弱。

从历史来看，相对先进的农业形式，能够确保社会维持大规模人口以及社会的有组织性，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有资料显示，中国在12 000年以前就已经开始种植谷物，比美索不达米亚的农业文明早了8 000年。虽然中国北方通常采用旱地种植谷物，但也已引入了水田种植。谷物种植在第一个千年发展缓慢，但后来迅速得到普及，这不但推动了中国农业的大发展，还促使经济重心从关中平原转移到长江流域。这一时期发明了水稻种植新方法，包括育种、早稻、种子的系统选择、带踏板水车和许多先进的灌溉工具。新技术和新工具使得中国拥有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水稻种植技术，极大地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

到宋代时，先进的农作技术已在中国的广大土地上得到推广，并稳步推动南部边境的进一步拓展。农业繁荣促使人口迅速激增，1000~1300年中国的总人口几乎翻了一番。500~900年，砖砌路沿着大中华帝国的中部铺开，使得从帝国的首都到其他任何规模相当的城市，都只需要8~14天的时间。意义更为重大的是，河运（包括运河）、海运等水上运输方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各个水路体系连接成一个网络，为1200年全国市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正如欧洲最大的海港城市威尼斯居民马可波罗13世纪晚期所观察到的：“我保证自己所说的句句属实，这条运河如此之长，经过的地区和城市是如此之多，要

是测算它所能承载的航运量及其交通价值，那意义将超过所有基督教徒的河流再加上他们的海洋。”

到12世纪时，纸币在北方和南方的地位已经非常稳固，中国经济逐步走向商业化的道路。奢侈品和大米等必需品的大型跨区域贸易都很发达。在宋代，沿海贸易蓬勃发展，贸易范围远至日本和东南亚地区。城市化进程也相当迅速，例如，13世纪晚期，中国当时最大的城市杭州，已经拥有近700万人口：截至那时，中国成为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社会，城市人口大约占到全国总人数的10%。然而，这些城市在政治中心和个人自由方面，并没有发挥像欧洲城市那样的作用：自治地区城市的发展受中央集权结构制约的模式，直到20世纪才有所改变。由于政府的鼓励，在宋代特别是北宋一个半世纪的统治时期内，出现过学习和发明创造的浪潮。这个有时被称为中国文艺复兴时期的阶段，见证了传统考试制度的发展、新儒家思想的诞生、火药的发明、灰泥和雕板印刷术的使用、书籍的广泛发行以及数学、自然科学、天文和地理等学科的重大进展。其中大型纺纱机的问世，尽管从理论上来说，未能开辟一个类似英国数百年后经历的工业革命那样的时代，但是其意义几乎不亚于后者。中国不仅是当时世界上文化修养最高和数学水平最强的社会，其发明创造也是首屈一指的。相比之下，北宋结束长达两个世纪之后，欧洲的文艺复兴才姗姗而来。

第三章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4）

雕版印刷图书的发行、大百科全书的出版、日益增多的进京赶考者、数学领域取得巨大进步（尤其是代数的发展）以及学者阶层的出现，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能识字算术的社会。相比之下，只有*世界可以同日而语，那时的欧洲还处于望尘莫及的境地。中世纪时期，欧洲国家还大量借用中国的新式发明，包括纸张、指南针、独轮手推车、船尾舵、手纺车和雕版印刷术。截至那时，中国依然是东亚最先进的文明国家，对其邻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这些国家长期以来都是向中国皇帝进贡的中华附属国，都对中华文明的优越性表现出虔诚的敬意。

1300年以后，这段非同寻常的繁荣时期逐渐步入衰退期，中国中世纪的经济革命开始让位于一段时期的经济停滞，这个过程直到1500年才结束。蒙古的入侵标志着宋朝的灭亡——这个从多方面评价均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代，就此划上了句号，中国被蒙古帝国吞并，开始进入元朝。这是一段极不愉快的历史，中国人民发现自己被置于异族的统治之下，沦落到卑微的境地。经济之所以停滞不前，有几个原因。南部边疆原本拥有肥沃的未开发耕地，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发展的动力，但是此时开始涌入来自北方的移民，可想而知对资源尤其对粮食物产生的压力日渐加大。科学上取得的蔚为壮观的进步，此时也开始日益干涸。贸易的缓慢下滑和与外国联系的渐渐中断，中国开始逐步转向自身，内向性愈发明显。而在明朝之前的几百年里，中国都是或多或少地参与到持续的外向性过程中。中国向南扩展腹地，包括开拓肥沃的新农地。

宋朝统治者相当重视贸易和与外国人交流的重要性，特别是日本和东南亚，而且不止中亚、印度次大陆，甚至抵达非洲东海岸。而到了明朝，这一进程开始进入缓慢的逆转期。1371年，由于大规模的日本海盗对中国船只构成了威胁，明代明令禁止沿海居民出海。1390年的一项法令宣布：“今两广、浙江、福建愚民无知，往往交通外番私贸货物，故禁之。”在接下来的3个世纪里，明朝统治者又相继颁布了禁令，首先禁止私营贸易，然后是政府贸易。正如马戛尔尼所抱怨的，到1757年，广东（今广州）成为允许进行合法贸易的唯一港口城市。

1411年大运河的成功重建，连接了中国北方与长江边的稻米之乡，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关键事件，它标志着对沿海航运以及海军需求的大大降低。在将近四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从宋朝帝国江山的稳固到明朝早期出色的海上探险活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国家——拥有多层甲板帆船（多达4个甲板、4~5个桅杆和12个帆），使用船尾舵驾驶，有航海图和指南针，可容纳500人左右。15世纪，郑和下西洋，是一次伟大的航海壮举，其航行范围到达东南亚、印度洋和非洲东海岸。他所乘载的轮船，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但是，从此之后，中国的海上实力便急剧下降。1436年，政府禁止制造适于远航的船舰，减少小型船只的建造。为何会出现越来越严重的孤立和内省倾向，其原因不是十分清楚。但是后人未能延续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壮举，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明朝政治态度的转变；由于首都1421年从南京迁往北京，统治者对北部边界更为关注，对沿海的兴趣日益减少；更加关心航海的成本和为对抗北方蒙古而进行的军事探险的相对失利。统治者确实也存在一些担忧，因为沿海中心城市与其他陆地接壤，有可能成为*的发源地，毕竟维护社会秩序始终是中国统治者关心的头等大事。而且，中国当时的统治阶层骄傲自大，总认为他们的文明远远胜于那些野蛮人（即中国人以外的人），使得这种专断独行和孤立主义的观点似乎完全是自然而然和符合逻辑的。此外，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也使以大国自居的思想持续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然而，1500~1800年，经济停滞让位于经济的蓬勃发展和适度繁荣。国家的粮食供应稳步增加，一方面是因为种植面积的扩大，尤其是西部和中部省份移民安顿下来所产生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生产力的提高，包括一些新型农作物（例如玉米和花生）的种植，以及更好的水利灌溉系统。各方面的综合发展，促使中国人口在1400~1800年增长了5倍；而1300~1400年的时候，它还是呈急速下降态势的。中国在这一时期的表现往往容易被忽视：它被中世纪早期的经济革命掩盖，经济增长也只是伴随着相对较少的新发明，远不如宋代发明创造的规模和成果，另外，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中国最终未能实现工业革命，这成为1800年后对所有经济体进行考量的最真实也最无情的标准。不过，18世纪的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其次是印度，欧洲充其量只是经济大球场上中等水平的球员。正如亚当?斯密1776年观察所说的："中国比欧洲的任何国家都更为富有。"确实，一直到1850年，伦敦才取代北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正如我们在第1章中看到的，18世纪末叶，英国通过运用其殖民地的资源和本国充裕的煤炭供应，摆脱了日益增长的资源受限，但是中国一无所有，那么这片土地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当时拥有足够的可用资本，尤其是考虑到英国在参与棉花产业起飞的过程中，只消耗了相对较少的资本这一事实。尽管中国的商人无法享有英国商人那样的独立和权威地位，但是他们仍然受到了广泛的尊重，毫无疑问不会处于劣势地位。与欧洲相比，中国对投资的支持相对更少，但是中国也存在数量众多的大型国有企业。中国市场的成熟度比欧洲还高，建立的时间也更长久。伊懋可（Mark Elvin）认为，中国失败的原因在于他所谓的"高水平均衡陷阱"（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①。中国资源短缺的问题日益凸显：人们越来越缺乏木材、燃料、衣服、家畜、金属、还有肥沃的良田。整个19世纪都存在盲目的森林砍伐行为，在一些地方，木材短缺如此严重，以至于人们几乎无柴可烧，只能拿玉米秸秆做燃料。在河南、山东等人口大省，森林覆盖率下降为土地总面积的2%~6%，而同时期的欧洲国家（例如法国）这一比率高达~25%。在技术相对停滞的情况下，人口的持续增长给土地和其他资源带来了很大的压力，由于没有资源丰富的

海外殖民地，中国不具备能使其渡过日益严峻的资源受限难关的外生手段。

随着劳动力价格的下降、利润率的下滑以及市场处于停滞的状态，人们没有足够的动力投资于能够大量节省劳动力的机械，相反只能鼓励节约资源和固定投资。在这样的背景下，从技术飞跃到标志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工厂制度，几乎没有什么理由。正如伊懋可所说的：

“在融合了一种强烈的经济理性意识、一种对发明者的崇拜心理，以及一些引人注目的机械化天才的文明背景中，技术进步一直在推进。”

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英国国内对节省劳动力的机器的投资，是一种完全理性的行为，它实现了发明、应用、日益提高的劳动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相反，中国依然沉浸在陈旧的生产作业里。在英国，小规模家庭作坊被证明是后来工厂体制的先驱，而在这种农村工业化水平至少与英国持平的中国，却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英国的经济逻辑揭示了家庭作业与工厂体制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英国的情形并不适用于中国：广泛的农村工业化进程没有带来中国的工业革命。

第三章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6）

中国人眼中的“国家”

欧洲和中国之间最显著的差异，不是它们对各自工业化进程时机的把握，而是两者政治构成的本质存在深刻的不同，这种状况至少持续了2 000年，而且其影响难以计数。毕竟，这能够解释为什么在理解中国时欧洲模板显得那么贫乏无力。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哪怕拿破仑和希特勒再野心勃勃，欧洲也没能够对几乎整个大陆行使中央集权控制的帝国政权统治。相反，政治权威转移到了许多小国手中。甚至在统一的进程和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创建的过程中，欧洲仍然保持着分裂为多国家制度的特征。与此相反，中国从未丧失过帝国的国家制度，这种体系是经历了紧张的诸侯间争斗后显露出来的。实际上，除了外蒙古以外，今天的中国，仍然或多或少地与其在清朝达到最大地理范围时所获取的国家保持着共同的边界。中国的平衡状态是一个统一的农业帝国，而欧洲则是一个由诸多国家组成的团体。

由此可以得出中国人和欧洲人态度上的根本差别：在中国人视统一高于一切的时候，欧洲人更相信民族国家而非欧洲范围内的主权——尽管成立了欧盟。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导致古老帝国的分裂和众多新型国家的建立，而中国并未发生类似的事情，甚至连丝毫可能发生的迹象都找不到，这些事实都体现出中国渴望统一的内在动力。中国能够致力于统一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国家和人民把统一作为优先考虑的根本事项；期望国家在确保统一的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中国人强烈的身份认同感为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这并不是说中国的统一就是理所当然的：历史上大约一半的时间，它都处于不同程度的分裂状态。考虑到中国的幅员辽阔以及远远多于欧洲国家的多样性特征，我们不用对此大惊小怪。由于高度重视国家的统一，所以中国大体上逃脱了几百年来笼罩欧洲历史的内部战争，但是在四分五裂的时期，它往往要付出战争和饥荒的惨痛代价，尤其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中国处于长期的分裂状态中。国家频繁地出现分裂，加上由此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有助于增强中国人对统一的向往，统一的传统来自春秋时期的孔子，由于生活的年代正值中华大地饱经战乱之时，孔子深深意识到和谐的重要性。

中国和一些地位相当的欧洲国家之间，还存在另一个重要区别，即中国从来没有面临过试图限制其权力的贵族精英的竞争。到10世纪中叶，当时的贵族精英全部都被摧毁，其后果是没有一个精英能够享有独立于国家的权威——正好相反，精英深深依赖于国家赏赐给他们的地位。这种情形的关键机制是科举考试制度，到唐朝时，科举考试制度已经称得上很完善了。虽然贵族在这些考试中享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科举考试还是为社会的各个阶层打开了大门，成为皇朝招贤纳士的有力手段。对于那些考生来说，儒家经书是考试的重要内容，这有助于强化共同的价值观。在欧洲，除了一些极端的时期（例如战争年代）以外，精英仍然相对拥有一定的自主权；而在中国，由于精英都是由国家录用的，而且有效地成为国家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往往按照国家的旨意来行事。在皇帝的庇佑之下，朝廷在盛世时根本不用担心来自宗教团体（9世纪查封佛教徒的财产后）、司法机构、贵族成员、军队或城市中产阶层的挑战。不过其中最大的例外是文人，他们像孔子一样洋洋洒洒地写出惊世骇俗的文章，却与社会日常生活越来越脱节。

第三章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7）

故而，与欧洲的情形不同，中国从来都不受强有力的精英的制约，它享有广泛存在和不受挑战的权威。因此，在欧洲，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界限被明确地勾勒且争议不断，中国却不存在类似的情况；在中国，边界始终是模糊的，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没有必要去界定它们，因为中国不存在互相竞争的社会团体。界限，只是一个组织约束和资源限制的实际问题。相比之下，在欧洲，自主、竞争的精英——贵族、牧师和市民，都在为限制国家的权力而战斗。欧洲国家和精英之间的竞争，与教堂和阶级紧密相连；但是在中国，学者、农民、商人和艺人的功能分化，并没有转化为独立的权力基础或制度化的声音。

要治理的疆界太过广阔，中国没有——也不能——单纯依靠或主要依赖武力高压政策来行使其统治。那样做既不合理也不可行，实施起来所需要的资源也是极其可观的。与日本相比，中国的武装力量确实仍然显得比较薄弱，至少到20世纪初叶还是如此。相反，国家权力主要依靠通过高压政治来强化服从观念。在明朝和清朝，封建政权想尽办法向国民灌输在儒家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共同价值观和文化体系。相比之下，欧洲恰好相反：欧洲人并不把灌输价值观和文化思想当成国家的责任，19世纪末叶以前这些职责一直都由教堂来履行。无论是中国的普通民众还是精英人士，都认为这种道德教义本身是可取的，而且也是行使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对精英层而言，国家要求学校必须教授儒家经书，同时它还成为科举考试的应试科目。另外，它还促使普通民众遵守儒家教义，就连皇帝在处理社会等级和纳税等事务需发布敕令时，也频繁地采用道德的论调。中国还试图宣扬对神灵的尊崇，同时极力压制那些它认为会造成社会*的潜在因素。

除了宗教控制，中国在这些问题上比欧洲先进数百年，后者是到19世纪末叶现代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出现之后，才开始关注这些问题。正如历史学家王国斌所说：“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正因为缺乏对教育和道德教化的关注，欧洲的统治才会遭遇根本限制，教育和道德教化在欧洲统治中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政治体制可能在中国发挥的作用。”同样的说法可以用来描述中国实行户籍登记制度以便维持社会

秩序和预防社会*。进行社会控制的关键是家族和血统，这一点从古至今都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中国对家族和血统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欧洲。家族或血统关系盘根错节，均以追溯男性祖先为特征（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还只有不到500个姓），它们都是建立在正式成员关系基础之上的。每个家族都享有很大的权力，通常会排斥外姓人，因而也会造成社会的分化。

封建国家非常清楚善政的重要性和克制的必要性。善政思想与儒家传统密切相连，后者着重强调统治者的道德责任。例如，皇朝统治的一个持续性特征在于一种认知，即税收必须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以便农民丰衣足食，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避免抵制和反抗。这里也不缺乏问责制：皇帝的权力拜上天所赐，因此只要统治者治理不善，他的权力就可能被剥夺。在周王朝统治期间，周王首次阐明他治理国家是遵“天命”，自己是“天子”，民众要忠于天子的统治，宣称统治者必须对引导人类社会的最高道德力量负责。

第三章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8）

中国人的天子概念，不同于西方人认为宇宙是由神明创造和控制的看法，对于中国人来说，天子胜于一切，但他并非造物主。与西方人“君权神授”学说不同，天建立在“生”的基础之上，上天的子民通过道德获取力量，这一做法使人民不会质疑统治基础，只去思考皇帝的道德统治及其政策是否合理。连年的收成不佳、日益严重的贫困现象、一系列自然灾害（例如洪水、地震）发生之后，人们可能会质疑皇帝的统治权力：这种日益增长的合法性危机，可能导致和经受声势浩大的民众暴动，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暴动，是19世纪的太平天国反对清朝统治的运动，那时，上千万的民众都开始相信：天命已经召回。

中国关于道德作用的假定，只是它如何看待自己的责任这一极其广泛概念的一部分。天命意味着，国家在干预社会生态和经济问题的同时，还要调节人民的生活，这是他们的职责。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国家管理粮仓储备以确保粮食的供应能相对满足人们的需求，从而保持粮价稳定，这可以追溯到元朝甚至更早。国家还对一些从时间标准来衡量可谓规模庞大的基建项目，例如为防止干旱而治理黄河、建设大运河等承担责任。在上述每一个问题中，中国人眼中的“国家”责任与欧洲的都大相径庭，欧洲人在随后几个世纪中都认为国家责任仅仅是立法。以上情况也有力地说明了，中国的发展是独特的，这也驳斥了其他国家必须遵守以欧洲为中心的发展路径的单一观点。

总之，事实上恰恰相反：中国很久以前就获得了一个“现代国家”的许多特征，与欧洲的历史进程相比，它应该已经完成了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此外，从后来的17世纪起，在这些力量的驱使下，欧洲民族国家的扩展逐渐向外向型转变——战争的危急、国家对财富的追求、政治代表的呼吁，这些都与中华帝国形成和发展的因素截然不同。与欧洲不同，官僚机构在中国已经存活了1 000年；它很少与邻国发生战争，大部分时间都与邻国相对和平地共处，双方维持着朝贡体系内的关系。甚至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清王朝的统治已经走向灭亡时，公民身份对于中国来说还是一个很陌生的概念。在中国和欧洲，国家创造的活力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存在着深刻的差别。

内忧外患

19世纪的最初几十年，清王朝面临的问题开始逐一显现。它第一次尝到的苦痛，是最终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打败。在后来的19世纪中叶，随着经济困难开始增多，加上一系列地方起义和四次影响巨大的起义活动（即1855~1873年的云南回民起义，1862~1873年西北地区突厥后裔发起的另一场回民起义，1853~1868年北方的捻军起义，以及1850~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清朝统治开始动摇。

在所有这些叛乱中，太平天国运动是影响最大的一次起义。由于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与英国交锋失利，王朝政权的统治基础已变得岌岌可危，加上1848~1850年发生的严重洪涝灾害和饥荒，太平军首领认为举事的条件已经成熟。太平天国运动最先从中国南方开始，随后跨越长江下游的许多肥沃地区，辗转到北部和西部，直逼北京：据估计，这次起义造成了大约2 000万~4 000万人死亡。太平天国运动的创始人洪秀全极力向众人说教自己对基督教《旧约全书》的看法。保罗?柯文将太平天国的思想体系描述为，“一种融合了福音派基督教、原始共产主义、性清教和儒家乌托邦主义的怪诞炼金术”。起初，这场运动得到了从北方迁至南方的各少数民族尤其是客家族的大力支持，并包含一股强烈的反满族势力（清王朝是满族人的天下）。运动持续了几年，但结果一直不甚明朗，最终为清王朝和英法联军所*。尽管清王朝最后取得了胜利，表明它仍然拥有非常强大的力量，但是其道德权威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而且再也没能恢复。

第三章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9）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西方国家日益增强的勃勃野心和侵略行为，逐渐成为19世纪70~80年代的清朝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朝设法抵制英国的要求，但未能成功，最后只能允许进口产自印度的鸦片，并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代签订的许多不平等条约中的第一个，它涉及赔款、割地（损失香港岛）和设立4个通商口岸等内容，英国在这些口岸享有特许权。不过，鸦片战争失败造成的影响是有限的。鉴于英国入侵的事实，清朝政府没有被迫重新考虑自身的态度：实际上，这个王朝国家继续对英国和其他国家一视同仁，无论是北方草原还是中亚地区，再或者是其在东亚和东南亚的附属国，例如朝鲜和越南。中国人的优势心态和自信意识仍然顽固地存在。这种状况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才开始有所变化，在这场战争中，英法联军洗劫并火烧圆明园，最终与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这些条约导致了一连串新的通商口岸的出现，在通商口岸地区，西方公民被授予治外法权；容许其建立外国军事基地；传教士享有在中国境内旅行的自由；给予更多的赔款。中国开始失去对一些重要管辖区域的控制权。

1884年，在对越南战争中，法国成功粉碎了中国海军。在历史上，越南长期保持与中国的朝贡关系，如今却被法国殖民统治颠覆。海军之战暴露了一个发达的欧洲工业国家同一个农业大国之间的悬殊差距。战斗刚开始，中国的旗舰就被鱼雷炸沉，不到一小时，所有的中国战舰都被摧毁，从此，法国控制中南半岛的道路变得无比通畅。

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转折点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如同与法国的战争那样，这关系着中国对其附属国的影响力，朝鲜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与中国关系最近的附属国之一。面对工业强大、越来越咄咄逼人的邻国，中国遭受了屈辱性的失败，被迫与日本政府签订《马关条约》，赔款超过清政府年收入的3倍。朝鲜变成了日本的“保护国”，中国失去了台湾和东北地区，并进一步开放了4个通商口岸，日本赢得了在现有的多个通商口岸中建造工厂的特权。日本的胜利让西方列强看到了希望，它们纷纷对中国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并逼迫中国做出一系列让步。到20世纪的时候，随着英国、法国、日本、德国、

美国、意大利、奥匈和俄国等八国侵入中国境内，中国的主权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和制约。

强加给中国的主要不平等条约

与英国签订的《南京条约》（1842年）

与英国签订的《虎门条约》（1843年）

与美国签订的《望厦条约》（1844年）

与法国签订的《黄埔条约》（1844年）

与俄国签订的《瑷珲条约》（1858年）

与英国、法国、俄国、美国签订的《天津条约》（1858年）

与英国、法国、俄国签订的《北京条约》（1860年）

与普鲁士、德国海关联盟签订的《中德通商条约》（1861年）

与英国签订的《烟台条约》（1876年）

与葡萄牙签订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1887年）

与日本签订的《马关条约》（1895年）

与俄国签订的《*》（1896年）

与英国签订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1898年）

与英国、美国、日本、俄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匈、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签订的《辛丑条约》（1901年）

第三章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10）

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1915年）

在日益高涨的反西方情绪刺激下，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并受到1861~1908年享有实权的慈禧太后的暗中支持，起义者对外国传教士及其他西方势力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击。最后，英国、日本、法国和美国组成的一支外国联军侵犯北京，*了这次起义，并在紫禁城驻兵一年多。清政府被迫做出更多让步，其中包括新一轮的赔偿。虽然中国没有陷于殖民统治，但实际上它已沦为半殖民地社会，外国军队可以自由进出。其通商口岸类似于小型殖民地，传教士拥有特许权，可以到中国境内任何一个他们想去的地方进行传教和劝诱改宗的活动。外国公司有权在中国建立子公司，不用缴纳任何赋税或关税。中国蒙受了极大的耻辱，变得日益穷困。但是，即使后来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并向南征服了大片土地，中国也从来都没有沦为殖民地，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对于中国1949年之后的复苏来说，无疑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国政府在面对日益增长的外国干涉面前显现出来的无能为力，刺激部分有志之士发起了一系列旨在让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改良运动。然而，与日本不同，中国清政府实施变革的决策，是由极少数精英做出的，并且从来没有获得大众的广泛认同和一致同意，所以其最终结果只能是，这些改良一直在犹豫和零碎中进行着。除了一些文人和诸如康有为那样的有着广泛社会关系，而且精于新思维和传统儒家教义的学者之外，此次改良运动的发起者还有清政府的一小部分官员。问题在于，除了1898年的短暂时刻，他们从来都没有得到过统治者的支持。中国政府既不理解也不接受现代化的必要性，更不用说会发出一种紧迫感，他们仍然采取消极的或者积极反对的态度，不像1868年后的日本政府那样，是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动力。然而，这是关于武装部队和各个政府部门的改良，包括首次在伦敦和巴黎等大都市建立外交场所，进入20世纪之后，还对教育课程进行了修订，加入了西方的科目。当1898年改良运动达到高潮时，它终于受到清王朝统治集团的鼓励，但是这种认可仅仅持续了几个月。

改良者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现代化进程逐步变得与西方国家密切相关，而当时，西方国家正在对中国实施殖民统治，整个国家蒙受了百般羞辱，所以，这帮改革者被统治者视为受到西方蛊惑，更为糟糕的是，他们被当做国家的叛徒。结果，中国人民对西方国家发出来的越来越多的敌意和不满，一并反映在反对改良运动的进程上。中国拥有单一的和高度集中的政府体系的事实，也阻碍和扼杀了推动本身就摇摇欲坠的改良运动的发展，相比之下，日本的权力更加分散。在儒家思想统治下，这个问题是混合存在的，使得其他思维方式很难享有一席之地。直到1900年前后，改良的想法才被实际纳入了儒家思想的框架内，并受到广泛的争辩——坚持区分中国“本质”和西方“方法”（另一种说法即张之洞的名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那之后，其他思维方式才开始占据一席之位，包括各个派别之间的社会主义思想和*主义思想，这个过程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并最终在1911年的革命中达到顶峰。尽管在此期间，儒家思想的地位开始下滑，但是它并未消亡。人们也不应该认为它与变革无法协调。不过，它确实迫切需要像早期与佛教和道教所发生的那样，同其他的思想相互融合以重获新生。

第三章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11）

在20世纪的最初几年，清王朝面临着深刻的权力危机，主权十分有限，需要不断地寻求占领国的批准。由于被迫支付大量赔款，其经济状况日益恶化，政府不得不依靠从外国银行贷款来履行义务，这意味着它经常处于财政窘迫的状态。清王朝赖以粉碎各种叛乱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军队，也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离心倾向，同时其体制还面临着越来越强烈的民众的不满和失望，对抗清朝的反满情绪不断蔓延。

清王朝在辛亥革命后彻底垮台，这个统治中国长达266年之久的朝代，最终让持续了2 000多年都未被改写的王朝体系在中国大地上落下了帷幕，中国这段漫长的王朝统治经历，创造了世界历史上最为长久的连续统治的奇迹。它被孙中山建立的国民党政府替代，但是却无法迎来一个全新并充满更多希望的时代。孙中山创建的体制，被证实是中国后来出现的军阀割据局面的前奏，在军阀割据中，有限主权让位给一种更为糟糕的东西，即慢性的多重分裂主权。孙中山处于一种非常软弱的境地，既没有军队受其指挥，也没有政府机构供其支配。他让位于袁世凯，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1916年袁世凯死后，他委派到各省的军政府首长们彼此争吵不休，在各国列强势力的支持下共享统治大中华的权力。1916~1928年是军阀混战时期。不仅当时整个国家——如果不从法理的角度而从事实角度来看的话——已经分裂，而且这也是几百年来头一次出现军事势力和外国存在变成中国未来仲裁者的情况。

仅仅在1928~1937年的9年时间里，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被推上国民党领袖的位置，中国才变得相对统一。但是即使在这段时期，蒋介石的权力也受到了限制，因为日本占领东北地区，其他外国列强也在中国境内驻扎。他的政权缺乏农村地区的支持，而共产党在南方地区汇聚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还于1934~1935年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试图躲避国民党对他们的正面攻击。1937年，这个国家还面临着进一步的精神创伤，日军从东北大本营向南推进，占领了中国富饶肥沃的东部省份——在那里聚集了中国大部分的产业。蒋介石早期将所有精力都放在与中国共产党的斗争上，还默许日本人对东北地区的占

领，到最后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日本对中国实施了以南京大屠杀为代表的极其残酷的殖民统治，这对中国人民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伤，甚至直到今天，它还困扰着中日关系的发展。在1937年之后，共产党以爱国者的身份成为抗日战争和争取中国独立的中坚力量。1949年，由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最终上台执政。不像1911年的辛亥革命——它实质上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逗号，是后来出现的将近40年的权力划分和外国占领的前奏，事实证明，1949年才是具有决定性的历史转折点。

从这段中国历史上最痛苦的时期，人们可以总结出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从来都没有解体呢？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为什么至少从长期来看，西方和日本占领对中国的影响还是相对有限呢？

1911~1949年，中国分裂的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1911~1916年，实际上曾经出现过三次地方政权宣布从中央政府脱离出去的情况。然而，这些举动只是为了对中央政府的某些特定行动做出回应，而没有涉及原则问题。实际上，在当时的情况下并不存在另一种足够强大的认同能够为分裂国家的形成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基础。在中国辽阔的心脏地带，类似的分裂或独立运动从来没有取得过任何进展。实际上，在19世纪末叶，受反满情绪的影响，汉族身份的认同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排外性更强，而地区性认同不得人心，也没有得到任何民族主义的支持。而且，随着中国进入由西方主导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它也受到了现代民族和国家主义的约束——而外国的占领和统治给中国人带来的苦难经历又强化了多个世纪以来由独特的农业文明孕育的文化认同感和凝聚力。

第三章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12）

为什么其他地方例如非洲和中东地区的经历证明，外国占领会给本国带来严重的伤害，而在中国，这种影响却是如此相对有限呢？首先，由于幅员辽阔，中国从来没有被完全殖民化，甚至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这也许是因为，除了日本之外，其他占领国都没有将中国变成殖民地的想法：整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继续在中国的主权下运转。除了东北以外，被外国持续占领的主要是通商口岸，它们实际上是中国广阔无垠的农村腹地背景下的一小撮飞地。其次，到1800年之前，中国是一个先进的农业经济实体，拥有广泛的农村产业化、规模庞大的商业化和相当成熟的市场。一旦外国占领走到尽头，中国可以利用这种文化、技能和传统，来实现其工业化进程。再次，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最先进的政治体制和治国策略，这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可以高效使用的巨大资源，它们在整个国家的建设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这与非洲和中东的后殖民地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那些地方，现代国家的建立基本从零开始。强大的中国认同感，显然有助于中国人抵制西方和日本殖*义所带来的许多文化和心理方面的负面影响。中国人对西方列强和日军的到来，始终保持极其敌视的态度，并对自己被迫做出的让步抱有一种深深的耻辱感，举个例子的话，这与印度的情况就完全不同，印度学会了适应英国的统治。尽管这样，中国人从未失去对他们自己的历史和文明的内在自信，或称优越感。

1949年之后

到1949年时，中国已经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主权削弱的状态。实际上1911年之后，中国遭受的不仅仅是有限主权，还是多重主权：中央政府不得不与占领国（多重殖*义）和国内的割据势力一起分享国家权力。可能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这种情形让人难以接受，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长期独立历史，尤其是执著于统一体制长达2 000年之久的国家来说，这种状况简直无法容忍，它严重地吞噬了这个国家的自豪感。共产党人面临着三个相互关联的任务：主权的回归、国家的统一和单一政府的重建。尽管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是日本人一直到“二战”结束才投降并撤离中国。1949年，随

着共产党取得胜利，中国终于取得统一。正是共产党实现了国家独立和国家统一，因此1949年的共产党政权获得了广泛支持，直到今天依然如此。这是毛泽东最伟大的一个成就。

经历前40年的劫掠、帝国的覆灭和国民党的失败之后，共产党肩负着建立一个全新执政体制的艰巨任务。自西方崛起以来，中国在现代化问题上面临一系列战略选择：改革传统的封建体制，但1911年以前这种尝试未能获得成功；效仿西方的模式，但是这种做法在1911~1949年遭遇严重失败；借鉴外国历史来创建新的体制。事实上，最后一种选择变成了共产主义者的行动方案，虽然部分灵感源于前苏联，但是总体来讲，毛泽东思想是在本国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产物，而不是舶来品。共产党人从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初期较小的革命根据地，从1937年后抗日战争中他们所控制的不断扩大的根据地中，还从1945~1949年内战中他们管辖的地区里，积累了很多施政经验。无论是晚清帝国，还是孙中山和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都面临着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对政府收入失控。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迅速重申中央政府对收入和支出的控制权。虽然从18世纪以来，财政收支的实权一直保留在地方政府的手中，但是中央政府再次收回了财政大权。

第三章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13）

共产党是新执政制度的核心力量。它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一种高度有效的管理机制，当然，这都是相对于晚清政府和国民党来说的。在此，有个关键人物，即毛泽东。作为革命的设计师和新中国的创始人，他在赢得民心和新政权合法性等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即使到今天，他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崇拜的人物。1949年之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支持者是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群众，国民党的势力则主要集中在城市。这与布尔什维克完全不同，后者的支持者主要集中在城市，农村势力较为薄弱。新政权所表现出的根本实力和应变能力，主要体现在毛泽东去世后共产党进行自我革新和修正“*”所导致的灾难方面。尽管“大跃进”和“*”给整个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地重建了在国民心目中的合法性，随后又着手进行了一项独特而成功的经济政策，引导中国走上了经济快速、持续发展的道路，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和西方国家，用各自不同的方式评价1949年以后的时代，但两者都非常强调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一个新的起点，中国连续性和传统习俗的一个分界点。不难理解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中国共产党强调他们创建了一种全新的制度。毕竟，那才是革命的本质所在，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对一些传统不良习俗表现出极大的改革决心，从妇女长期遭受压迫到儒家的等级观念，并以阶级斗争的名义实行了全面的土地改革。与此同时，除了“二战”期间的短暂时期外，西方国家始终把共产主义政权视为魔鬼的化身和怪胎，从历史到当代皆是如此。他们很少尝试在历史和文化的背景下理解中国，也很少试图体会中国与先前历史的连续性而不仅仅是中断性。因此，出现了这样的倾向：忽视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与历史上王朝时期之间的强大连续性。正如王国斌指出的，尽管儒家思想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分歧很明确——等级观念与平等意识、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但是它们之间也有很重要的相似性。例如，儒家传统也强调减少不平等现象、限制土地规模和重新分配土地的必要性。同样，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国家必须为人民负责，这是中国的一项古老传统，只不过共产党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延续了这个传统。在经济和社会安全领域，国

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毛泽东时代，国有企业必须向员工提供住房、教育、保险以及稳定工作。

另外，两者在政治上也存在很多相似之处。儒家思想和共产主义的统治模式，都涉及人们与国家之间的隐含契约：如果国家未能履行其义务，那么农民就有孟子所倡导的反叛权利。在皇朝年代，这种思想的表现形式是天命；在社会主义时代，则是以阶级斗争即无产阶级抵御和战胜资产阶级的名义体现出来，在毛泽东时代，这成为实行自上而下大规模动员的一种舆论，并在“*”时期达到了顶峰。国家与这两个传统问题之间的关系，是专制的和等级的；这与西方国家直叙政治权力和正式代表机构的传统截然不同。儒家思想和共产主义传统之间的连续性还有更深层次的表现。两者都面临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巨大分歧的问题，并且都力求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管理它们。儒家传统是通过科举考试的手段，招募一个由高学历、高素质的精英人才组成的管理团队；而共产党人还通过采用发展党员的方法来为国家招募贤才。

第三章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14）

因此，共产党传统和王朝历史之间存在很强大的连续性。新中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才能更好地理解它。王赓武的观点相当明确，他认为新共产主义国家是“对旧皇朝帝国的取代”，并且“毛泽东有效地恢复了关于领导人魅力的观念”。国际关系专家赵穗生提出了与此类似但略有不同的论断：

“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主义为指导建立起来的。然而，与共产主义的普遍原则相比，它与中国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的重创辉煌，与中国未来的现代化更为相关。”

正如我们将在第二部分看到的，中国现代性的轮廓不仅留有共产主义的痕迹，它背负的更多是中国的历史印记。

经济腾飞

中国与西方列强和日本，大约是同一时期踏上工业化道路的，但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最后以失败而告终，19世纪的中国为此遭到严重的打击。大约从1860年开始，中国就出现许多工业发展水平与日本相当的显著例子，尤其是上海地区。但是，考虑到中国的辽阔地域，其工业进展又显得太琐碎、太分散。尤为重要的是，中国缺少日本现代化的两个关键要素：强大的现代化政府和可以为工业化提供盈余资金的富足的农业。更糟糕的是，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后，巨额的赔付条款和面对西方国家及日本提出的各项无理要求时表现出来的无助，几乎让中国元气大伤、濒临破产。西方列强通过划分新的势力范围和获取“租界”，继续剥削已经伤痕累累的中国。随着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数量的急剧膨胀，外国资本不断流入中国，它们热衷于在这种几乎毫无限制的背景下去赚取高额利润。1920年，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写道：

“整个中国经济都依赖于上海、香港、青岛、武汉的大型外资银行和一些实力强大的外资公司……海关、盐税的行政管理部门和邮政服务都由外国人经营，他们攫取所有利润。在神州大地上，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军舰及商船随处可见——遍及港口、海岸和长江流域。除了少许的中国公司……整个现代工业部门（服装厂、烟厂、铁路、水运、

水泥厂、肥皂厂、面粉厂，在城镇还有煤气、自来水和电力以及公共交通），都处于外国公司控制之下。”

中国的人均GDP，1820年为600美元，1850年没有变化，1870年甚至跌至530美元，1890年为540美元，1913年为552美元，这些数字生动地说明了中国这一期间所处的困境。1950年，仅为439美元，是1820年的73%，比1850年的还要低。这都说明中国经济在过去120年里的灾难性表现，而其中外国势力的侵入和占领是最主要原因。所以，中国现在只要提到1850~1949年这100年，就将其称为“屈辱的世纪”——这个说法很能说明问题。日本明治维新后约80多年，也是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一个多世纪之后，中国才刚刚开始走上经济腾飞的道路。

除了恢复国家统一以外，新中国面临的中心任务便是工业化。为此，它实施了大量的土地重新分配和建设大型公社的方案，以收取农业税的方式从中提取农业盈余，然后投资于重工业部门的建设。其经济政策较为特殊，就是避免运用市场的力量，主要依靠国家和中央的统筹规划，这与苏联模式如出一辙。尽管毛泽东的领导经历了沧桑变迁——尤其是“大跃进”和“*”——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中国还是令人惊奇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50~1980年，其年增长率达到，整个国家的GDP翻两番，人均GDP翻一番。相比之下，印度较为逊色，同一时期印度的GDP只增加了不到3倍，人均GDP仅增加50%。中国的社会表现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重点强调教育优先、扫除文盲、促进平等和改善医疗，其人类发展指数提高了倍。中国还设法规避了困扰其他许多亚洲国家以及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问题，如人口增长、农村地区的贫穷、巨大的贫富差距、男女不平等、城市居民大量失业、教育和卫生经费薄弱。

共产党第一阶段的执政，彻底扭转了中国的国家命运。这一时期取得的成就，为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20世纪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失败已经困扰中国历史近百年。从1949~1978年，新中国成立的第一阶段扭转了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衰败局面，实现了先前的政权无法创造的经济腾飞，而且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中国转型的基础是在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历史证明，1949年革命完全不同于1911年辛亥革命，它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

外资报告：中国的红色警报（全译本）

2010年04月02日 11:58

本文来源于财新网(来源不可删除，谢谢合作)

此为美国著名投资公司GMO发表的研究报告，列出了中国可能发生经济危机的十个特征。报告一面世，就引起了中国是否存在泡沫的又一次大讨论

编者按：

3月23日，美国著名投资公司GMO发表了这篇研究报告。一经面世，就引起了关于中国是否存在泡沫的又一次大讨论。此前，今年1月，美国著名的空头投资者詹姆斯?查诺斯预言，中国经济可能面临巨大的危机。

华尔街近年一直追捧中国，但内心深处的一丝隐忧始终存在。这份报告把这种担忧表达了出来。

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李晶已经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反驳文章《中国固定资产投资飙升未必是坏事》。但李晶的观点不乏批评者。财新网的名家博客Barrons即撰文驳斥。

财新网已经在3月31日刊登文章“美国著名基金预警：中国现狂热投机先兆”，介绍这篇报告。

为了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报告的内容，财新网将全文作了翻译，全文约1.2万字。

【财新网】（记者 陈璐 实习记者 黄玉蕾 译）金融危机之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前景十分萧条：家庭需要减债，西方政府不得不勒紧钱袋。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许多投资者把目光投向了中国。投资者的这种热情很容易理解，因为中国有着13亿人口，且经济增长空间巨大。目前，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但中国有非常好的增长记录。过去的30年里，中国的GDP增长了16倍。

那么其中的蹊跷在哪里呢？那就是，目前中国呈显出了许多投机狂热的特征。本文的目的就是描述历史上一些著名泡沫的特征以及概述中国经济目前的脆弱性。

第一节：识别投机狂热和金融危机

我们能够在泡沫破裂前就识别出投机狂热么？我们能够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就看出它的端倪么？纵观那些著名经济学家、央行官员以及华尔街权威人士在过去十年中的观点，上述问题的答案就是：不可能！

但事实上，泡沫还是可以在事前识别的。尽管经常被忽略，但确实也有一些人在研究判断金融危机的先行指标。几年前，这套指标中有不少指标反映，美国和其他一些地区的经济变的很脆弱。而今天，这些红色警报盘旋在华尔街新宠——中国的上空。

过去的投机狂热和金融危机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下面，我将列出三个世纪以来著名泡沫的十大特征。

1.巨大的投资灾难往往始于一个令人信服的增长故事。

它可以是一些革命性的新技术，比如19世纪的铁路、20世纪20年代的收音机，或者最近的互联网。即使这些技术都是真实的，但它们的预期增长率却可能被高估。早期的快速增长，往往让人们推定，这种增长会持续到遥远的将来。

同理，这样的增长神话也可能针对某个特定的经济体。某个经济体将有潜力成为霸主，在很多时候往往是投资者的一场空想。1719年的法国密西西比泡沫，源于就是被约翰·劳（John Law）的印度公司（Compagnie des Indes）所吸引，相信其可能使法国成为欧洲的霸主。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东京，投资者们蜂拥而至，就是因为相信日本可以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2.对当局能力的盲目信任是另一个典型狂热的特征。

20世纪20年代，由于美联储的成立，人们相信经济的繁荣与衰退交替的周期已经终结。一个“新时代”已经开始，人们认为股票不再那么有风险，股票估值直线上涨。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个相似的理由也悄悄流行，人们相信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已经驯服了经济周期。“新范式”在新千年中的熊市中消失了。很快，它被伯南克的“大缓和”理论所取代，伯南克认为，高水平的按揭债务是可行的，因为货币政策制定者的水平已大大提高。哎，结果证明“大缓和”不过是又一个可笑的自我安慰：人们在被哄骗时，经常会自己安慰自己：“这一次是真的不同了”。

3.投资的普遍增加。

这是金融灾难的另一个先行指标。在盲目的乐观中，资本经常被胡乱浪费。只有泡沫破裂之后，这种错配的恶果才显示出来。正如19世纪经济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Mills)所说，“恐慌并不摧毁资本。资本在此前因为投入毫无希望的无效项目中被摧毁，恐慌只是反映出被摧毁的程度。”

在19世纪40年代英国狂热的铁路投资中，伦敦与Peterborough之间建了三条铁路。但其实，只要一条铁路就够了。技术泡沫破裂后，新的光纤网络过剩了很多年。而IMF最近发布的一份世界经济展望中指出，GDP中投资占比过高，往往会致使国家遭受最严重和长期的经济低迷。

4.腐败激增总是与巨大的繁荣相伴而来。

正如维多利亚时期伟大的新闻人、经济学家Walter Bagehot所说，“所有人在最快乐的时候总是最容易轻信别人，当他们拿到钱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欺骗他们的绝佳机会。”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1929年大崩溃》（The Great Crash）一书中，描述一个欺诈行为的链条。“在繁荣时期，人们总是放松的，愿意相信他人，钱总是很多。但即使钱再多，也总有一些人要更多的钱。在这种情况下，贪污的比例就会增长，被发现的几率就会减少，收受的赃款也就会更多。”

5.宽松的货币。

货币供应的强劲增长是金融系统脆弱的另一个重要指标。自17世纪30年代得郁金香狂热事件以来，在所有的重大投机背后，总有宽松货币的身影。低利率让投资者寻求更加高回报，更有风险的投资。Walter Bagehot写道，“英国佬（John Bull）可以承受许多事情，但却不承受不住2%的利率。”他评论道，当利率下降到如此微薄的水平，就驱使人们用千辛万苦攒下来的积蓄去投资一些不靠谱的东西——比如一条通往堪察加的运河、一条去沃切特的铁路、一个让死海复活的计划、以及一个往热带运输冰刀的企业。

6.固定汇率。

固定汇率国家往往产生不合理的低利率，它虽然能轻易催生繁荣，但最终会以泡沫破裂终结。欧洲货币联盟的创始人就是忽略了这点，他把低利率和繁荣的房地产带给了西班牙和爱尔兰这两个小成员

国。固定汇率还造成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大规模的资本流入也是金融不稳定的另一个重要指标。

7.信贷疯狂增长。

危机通常发生在信贷长时间疯狂增长之后。在繁荣经济时期借的债，最终无法偿还。国际清算银行的经济学家研究表明，贷款严重偏离过去的轨道，呈现超乎寻常的增长，有80％的概率导致金融危机。最近对过去一个半世纪的信贷繁荣的研究也表明，“信贷长期超常增长是金融危机的重要预测指标。”

8.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是巨大投机狂热的另一个共同特征。由于人们普遍相信当局不会让金融系统出现问题，贷款的繁荣往往因此走向极致。不负责任的行为得到了纵容。格林斯潘在美联储的任期之内，市场普遍相信，只要投机者遇到麻烦，他就降低利率，为市场注入流动性。“格林斯潘对策”对20世纪90年代的技术泡沫以及新千年的房地产热潮负有责任。

9.金融结构变得不稳定。

债务的增加并不是惟一需要担心的地方。经济学家Hyman Minsky发现，在繁荣时期，金融结构变得不稳定。用借来的钱进行的投资，回报无法偿付贷款。（Minsky称其为“庞氏骗局”)。结果就是，金融系统会变得越来越脆弱，即使是平时微不足道的小事件，诸如利率小幅上升或者资产价格下降，也会酿成大事。20世纪20年代的高杠杆率投资信托、最近十年来出现的次级债CDOs，都是庞氏骗局的典型例子。

10.快速上升的房地产价格。

有危险的贷款往往由房地产抵押担保，所以，贷款迅速增长与房地产价格的迅速上涨同时出现，可以很确定地预告未来痛苦的泡沫破裂。地产崩盘时，大量新建住房会让情况变得更糟，西班牙、爱尔兰和美国，最近都提供了血淋淋的教训。

总之，研究表明，信贷的迅速增加是金融系统不稳定的最重要的领先指标。资产价格泡沫的出现是第二个最为可靠的危机指标。低利率和快速的货币增长也是好的警告标志。由于投资泡沫造成资本错配，房市的崩盘会造成严重且长期的经济衰退。典型的投机狂热往往

由一个令人信服的增长故事和对当局的盲目信任相伴而来。这一切因道德风险和猖獗的腐败而变本加厉。

第二节：中国梦分析

全球信贷紧缩和经济大衰退的巨大痛苦，似乎本应足以让世界各地对金融有个清醒的认识。但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在美国，大量发放便宜的货币尚未能成功地解救垂死的房地产市场。而在地球的另一端，诸多指标显示，中国已经出现了投机狂潮和金融脆弱的典型症状。

1.中国梦

几个世纪以来，外国人都在想怎样从中国巨大数量的人口赚钱。今天，中国梦比以往更加生动。中国有超过13亿的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农村人口正逐步转移到城市。未来十年，大约3亿农村人口会搬到城市，美国的人口不过也就3亿。人们普遍预计，未来数年，中国将保持8％左右的增长速度。

近几个月来，中国已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并且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也是全球大宗商品的最大市场，近期才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汽车消费市场。中国工人的工资是美国同行的十分之一，但未来会与西方国家看齐。日本在1960年后的30年里就是如此。

中国必将崛起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最近持这种观点的书不少，如马丁·杰克斯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信心非常高。

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的预期，令中国成为华尔街的宠儿。如果他们是正确的，那么在未来几年中国工业品和消费品的需求将成倍增长。然而，就像上世纪 90年代对互联网的预期，这其中很可能被夸大了。

就像对网络的狂热，投资者似乎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中国的增长预期。比如，声称城市的人口到2025年会再增加3.5亿，到时接近10亿。但在目前，中国城市化率很可能被低估了，因为按照西方的标准，很多中国的农村地区的人口密集度其实已经很高。更复杂的是，许多农村向城市的移民因为没有居住证，可能没有纳入官方的统计数字。人均GDP是地方政府官员的一项考核指标，所以他们有动力低报人口数字。

许多新到城市的人没有户口，收入微薄，而且在过去10年的实际工资没有增长。这些人构成了周期性的劳动力，找的到活的时候来到城市，找不到活时离开城市。这些农民工为中国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来支持中国的出口增长和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像中国人口学专家学者所说，“将城市人口增长等同于中产阶级的人数增长，是片面的。”

华尔街趋向于淡化中国人口故事的黑暗面。中国的人口到2015年将会下降。同时劳动力数目也会见顶。新增的劳动力也会快速下降，然而，正是这部分人来到城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

如果农民工数量减少，实际工资将可能上升，这让工人的消费能力增加。但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这可能是双刃剑，因为该国的国际竞争力可能受到伤害。近年来，城市化一直是中国的生产力增长的主要来源。如果降低，那么未来的经济增长只有依靠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

2.我们相信中国政府

20年前，有人争辩说“日本是不同的”，而东京的经济政策是优于西方的。许多畅销书赞美那块太阳升起的土地。有一本书叫《日本第一》，如今臭名昭著。今天，同样有许多人说，中国经济是特别的，中国的政策优于其他国家。同样有许多人预计，中国将问鼎经济霸权。

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比前苏联成功的多。30年来，中国的经济不可思议地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本世纪初，政府在经济没有停顿的前提下，成功地解决了银行的巨额坏账问题。近年来，中国建立了达2.4万亿美元的巨大外汇储备，令其有了不可战胜的光环。

中国似乎成功地避开了全球金融危机，这进一步增强了决策者的声誉。在出口市场崩溃的情况下，去年中国经济依旧轻松超越了8％的GDP增长目标。

一位著名的英国投资者近日宣布，他放弃退休，到香港来运行一个中国基金。其中的一条理由是看好“中央计划的有效性”，现代中国的奇迹之一是，它使一些世界上最热情的资本家热烈地投入到社会主义的经济中。

不过，无论是经济理论和历史，都证明中央计划不是经济发展的最佳模式。中国确实迅速发展了三十年，但在中央政府看的见的指挥下，经济已成畸形。在金融危机发生前，中国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出口增长。中国向西方的出口，已经是日本最繁盛时期的两倍。不靠贸易保护，该国已无法保持贸易顺差。经济大衰退发生后，这种威胁变得格外尖锐。

非常高的投资水平也带来了资本错配的风险（这点在下面会更详细讨论）。还有就是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参与度过高。中央政府制订GDP增长目标，并分解给地方政府。问题是，地方政府可以糊弄中央。古德哈特定律指出，每当经济指标成为政策目标，它就失去了信息的作用。在中国，GDP增长已不再是一个经济过程的结果，而是成为了目标。

传闻证明，地方政府的许多决定，无论是开展新的基建项目和发展房地产，都是实现增长目标的需要。在许多方面，这使人联想起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公司在牛市时期设立的收入增长目标。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当资源分配的目标是为了一串数字，不好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中央的政策似乎也扼杀了国内企业。虽然国有企业的作用已经下降，但仍从国家控制的银行获得贷款优惠。相比民营企业，国企得到了优待，因为民企不得不从银行体系之外获得高利率的融资。香港金融管理局最近的一项研究称，如果国企以与民企同等条件的利率贷款，利润会消失；研究还发现，超过半数的民营企业没有机会从银行借款。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所写的书介绍，中国正从上世纪80年代的企业资本主义转向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将注意力放在大型投资项目（比如上海浦东金融区的发展）、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上。中国在此期间建立了诸多较好的基础设施，但经济发展伴随着收入不平等的加剧、GDP中的消费份额下降和创新的缩减（以上海新的专利衡量）。黄教授认为，中国的快速增长带有欺骗性的，因为国家可以比私营部门更快的速度投资。然而，投资的质量较低。

3.投资热潮

在市场经济中，经济不稳或混乱时，投资应该会下降。然而，在2009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30％，对去年经济增长贡献达到90%。投资创纪录地上升到GDP的58%。这些都是了不得的数字。关键的问题是：这些钱用的怎么样?

基础设施投入占去年的经济刺激开支的三分之二以上。大约四分之一的项目是政府主导的。许多项目明显是为了满足政府的GDP增长目标。 YouTube的一个短片（转播自半岛电视台）显示，内蒙古鄂尔多斯城有一个新建的“鬼城”。有被访者认为，这个空城，可容纳100万人，只是为了满足政府的增长目标。

相对于其经济发展的现状，中国已经有了高度发达的基础设施。去年，中国高速公路使用率估计为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12％。许多较小的机场仅使用了容量的一半。国家建设高速铁路网的计划，看起来令人印象深刻，但投资回报会成问题。国家发改委的一位交通研究人员警告说，拟建中的18000公里高速铁路，将面临成本收不回的问题，“可能无法达到实现收支平衡的最低客运量”。然而，大多数华尔街分析师仍然乐观。如果中国继续以过去的速度增长，他们说，那么所有这些新的道路，桥梁，铁路在短时间内亦将流量拥挤。

类似的问题在中国的重工业领域随处可见。当大衰退来临，非出口部门被要求不裁员。许多行业持续投资，尽管产能利用率较低。

制造业，其中低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三分之一，带动环比提高27％的资本支出帐户（2009年1月至2009年10月）。一项由欧盟商会的报告，去年11月生产能力过剩的包括造船业、平板玻璃、钢铁、水泥、多晶硅、风电。例如，在水泥行业资本支出增加了三分之二，但能力方面估计有78％运行的利用率。产能过剩由中国投资的高增长预期时间推算是合理的。

以高储蓄和投资和巨额贸易顺差，中国一直遵循一位评论家所说的“亚洲的增长推动模式”然而，这种增长模式的缺陷，在过去20年，即证明了日本的弊病。在1994年一篇著名的文章中，“亚洲神话的奇迹”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亚洲猛虎般的经济增长依靠不断增加资本投入。然而这种投资，依然受收益递减规律影响。

这一分析同样适用于中国，投资效率（GDP按每单位增量的投资增长来衡量）有下降的趋势。对于猛虎（日本）来说，穷人的投资范围显露在1997 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之时。中国的问题更大，因为它有潜在的投资占GDP的比例比任何其他亚洲经济体在历史上的比例都高。

4.腐败

所有巨大的投机性躁狂症都伴随着不断升高的欺诈。只有在萧条我们才可以看到这个 “怪物”的全部情况，如安然（Enrons）、世通（WorldComs）、麦道夫（Madoffs）的曝光。中国地产和基础设施支出的回升，为渎职提供了一个周期性激励。中国最近在2009年国际清廉指数排名中下滑至第79名，略低于布基纳法索。

房地产的繁荣为腐败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土地经常被夺走，交给开发商，而对被拆迁者补偿不足。金融部门沉迷于拿回扣。基础设施支出，让地方官员有机会中饱私囊，对劣质建材视而不见。中国是增长速度最快的奢侈品市场。然而，纽约时报估计，多达一半的销售与贿赂有关。

中国为裴敏欣教授所说的“分食”提供了佐证。系统性腐败降低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正如其他受害的一些亚洲国家，最明显的是1997年危机之前的印度尼西亚。裴写到，“流行性腐败”稳步提升了一个国家的系统性风险。正如因此，其金融体系脆弱，其环境退化和敏感，其执法强制腐坏而无效，其基建不安全，其公共卫生服务麻木不仁以及其监管系统摇摇欲坠。

5.宽松的货币

诺贝尔得主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不同于他伟大对手凯恩斯的理论。凯恩斯辩称泡沫是混乱的“动物情绪”，而哈耶克声称，过低的利率推高了资产价格通胀。哈耶克说，通过货币和信贷扩张产生的宽松货币，导致了一般价格或资产价格的通货膨胀。当利率低于它们的“恰当”的水平，企业倾向于投资在一些在遥远的未来才有回报的项目。这就产生了资源错配或“不正当投资。”

什么是恰当的利率，谁也不知。但经验法则认为，利率应与经济的中期增长相适应。在美国，最优惠利率平均比过去40年的名义增长高出一个百分点。相比之下，1990年以来，中国最优惠利率平均比GDP增速低约九个百分点。

低利率是中央政策的一部分，以促进投资和补贴国有企业。低利率也促使中国家庭投机股票和房地产。中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在过去十年已导致高通胀和资本市场的忽上忽下。在最近的一次泡沫中，上证指数从2006年初到2007年10月，涨了四倍多，然后又跌去70％以上。

去年，货币供应增长了近30％，而利率远低于经济的名义增长率。再次，中国储户发现自己陷于对通长的恐惧和对高回报的贪欲之间。再一次，泡沫在中国的资本市场形成。

6．固定汇率和资本流入

人民币是盯住美元的。低估的汇率促进了出口，并压低了利率。它还鼓励大量资本流入，主要以外国直接投资的形式。资本管制限制了热钱流入，不过，投机性资本流入最近有所抬头。

许多新兴市场危机是由其货币引起的，因此，看到中国高达2.4万亿的庞大外汇储备，许多评论家感到很安全。然而，这么大量的美元应该是令人担忧的。它反映了一个散漫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深刻不平衡。

美元的标准使得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可以消费大于产出，由此积累了庞大的对外债务。其他国家，大多在亚洲，享有持续的贸易盈余，并取得巨大的外汇储备。

有人认为，中国的巨大外汇储备使中国经济立于不败之地，这其实不对。这些储备可以用来购买外国资产、进口、或防御货币攻击。但有一类问题，它解决不了，比如，在资产泡沫破灭后，银行坏账大量出现，不良投资到处都是。正如一位评论家指出，相对于全球GDP，只有两个国家先前曾经累积过如此庞大的外汇储备，他们是1929年的美国和1989年的日本。

7.信贷繁荣

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出口订单的崩溃，中国下令银行放贷。去年，新的银行贷款增加了近10万亿人民币，相当于29％的GDP。这些贷款大部分流向基础设施、房地产、以及国有企业。这使经济仿佛受到了巨大的刺激，类似推注肾上腺素抢救心脏骤停。然而，大多数分析师没有考虑信贷狂潮的后遗症。我们自己最近的经验证明后遗症是明显的。

信贷扩张的规模本身就值得忧虑。信贷如此迅速地膨胀，很可能没有严格遵循标准。事实上，许多人相信，中国的银行体系会有另一次不良贷款的激增危险，就象20世纪90年代末发生的那样。然而，传统的智慧认为，只要中国维持经济增长速度，去年的贷款不会变坏。

8.道德风险

主要的中资银行是由国家控制。他们曾有滥发贷款的历史。然而，市场认为，银行现在不会出问题。中国主要银行的市值全球领先，已经太大而无法倒闭。它们是中央经济政策的主要工具。坏不了。

道德风险对银行体系带来的恶果，亚洲人并不陌生。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大银行也被视为财政部履行政策目标的工具，同时在利润上也受保护。当时，日本的银行市值雄踞世界第一。后来，这种信仰被证明是错误的。在“失去的十年”，日本的银行产生的亏损相当于它们的初始资本的两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好几个亚洲国家都暴露出道德风险对金融系统的危害。

给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贷款曾给中国的银行带来麻烦。本世纪之交，标准普尔估计中国不良贷款占未偿还贷款的约50％。银行被重新注资，不良贷款打包给资产管理公司。这个救援行动相对没有痛苦。一些人估计，中国可能故技重施。另一些人认为，没有必要担忧，因为中国银行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可以运用现代风险管理方法。如果中国的银行真的追求利润最大化，为什么还要在中央的授意下进行大规模的政策性贷款?

9．冒险的借贷行为

2007-2008年的信贷危机暴露了许多美国和欧洲银行恶劣的贷款决定。在音乐还在响的时候，这些银行降低了贷款的标准。许多贷款用现金流无法偿还，为了让贷款不坏掉，他们需要进一步的资产价格升值。当市场回落，这些金融把戏现出原形。中国最近的许多贷款似乎就属于这一类型。

例如，贷款流入基础设施项目，如新的铁路，收费公路和桥梁。这些项目由地方政府主办。然而，地方政府被禁止为贷款担保。相反，他们建立了融资平台，资本金由地方政府出，剩下的钱是由银行提供。据估计，去年一半的银行贷款，流到了这些地方政府的融资平

台里。这些基础设施项目中，许多只有少量的现金流，甚至没有现金流。

这些贷款将来怎么还？如果经济持续以过去的速度成长，可以假定这些新机场和收费公路将来都能产生收益。或者，地方政府可以靠未来的卖地收入来还款。麻烦的是，卖地收入占了地方政府收入的一半。因此，如果房地产市场回落，地方政府可能无法履行这些隐含的义务，顺利归还基础设施贷款。

华尔街分析师称，因为中国没有把次级贷款证券化，所以中国的贷款系统是正常的。但中国的银行业有自己的独特的可疑做法。根据惠誉国际评级的测算，很多银行把贷款重新打包，出售给散户投资者、其他金融机构和企业。

惠誉写道，“卖出贷款的银行承诺在未来某个时候回购贷款，在这种情况下，贷款可能不会出现在卖方或买方的财务报表中。”通过把贷款放在账外，银行得以让贷款增长率符合政府设定的限制之内。

中国银行业似乎特别不愿意报告问题贷款，因此没有人可以测出其信贷体系的健康程度。安永（Ernst & Young）会计师事务所2006年发表了一份报告，估计中国的不良贷款高达9000亿美元，这份报告随后被撤回。甚至在2008年股市崩盘和出口休克时，官方报告的不良贷款依然下降。惠誉指出，中国银行业习惯于不断地将问题贷款转期。银行员工也隐瞒不良贷款的动机。一个信贷员如果报告了他放出了问题贷款，他的工资会被 扣至低于农民工的工资。似乎很少人关心隐瞒不良贷款的做法，因为一般人认为，只要经济继续迅速增长，不良债权未来会转好。

10．泡沫

信贷激增重燃了中国投资者的动物精神。去年上半年，上海股市强劲复苏。去年7月下旬的某一天，上海A股的成交量超过了纽约、伦敦和东京三大证券交易所的成交量之和。去年第三季，以市值论，中国IPO占了全球的三分之二。全球最大的10个IPO，中国占有七个。新股往往高倍超额认购，上市首日暴涨。去年10月，深圳创业板市场推出。开市首日，28家创业板上市公司涨幅在76％至210％之间，市盈率平均达150倍。

高换手率、新股大量发行、新股一上市即劲涨、成立新交易所，这些都投机狂热的经典迹象。去年夏天，市场见顶时，上证指数的PE倍数为38倍。中国股票的高估值基于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憧憬。不过，股市只是一个插曲，真正的大戏发生在中国狂热的房地产市场。

本文讨论的许多红色警报信号在中国狂热的房地产市场随处可见：有一个夺目的增长故事（正在进行的城市化和未来的经济高增长率）；建设热潮帮助中国实现GDP增长目标；低成本信贷流入房地产领域；腐败到处都是；道德风险普遍存在，相信政府不会让楼市崩溃；资产价格高估，投机盛行，凯恩斯讲的“动物精神”到处都是。

住宅市场

由于现金的利率低、股票波动性大，对中国储户来说，房地产是一个更有吸引力的选择。根据摩根士丹利的报告，在过去十年中，全国房价以8％的年均速度上涨。这一贯表现使人们普遍认为，楼价只能上涨。

支持住房市场是中央经济刺激计划的关键一环：贷款利率被降低，银行被勒令打开信贷投放；抵押贷款的成数上升；向二套房的买家提供优惠的按揭利率；降低购房的税收。国有企业也受到鼓励进入住房市场。地方政府为购房者提供优惠券和居留证，他们还为新项目提供了近一半的融资。

这些措施施展了魔法。去年，中国的住宅销售上升到3.8万亿人民币，比2008年同比增长87％。平均房价在2009年上升8％。几个地方的市场出现20％以上的强劲上涨。住宅新开工项目也迅速上升。新建住房开工（按建筑面积计算）在去年前11个月上涨了16％。2010年住房建设预计将再上升 20％。这就提出了一个潜在的供过于求的问题。大家的一致看法是，新的供应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将随着经济持续扩大而被消化。

但按现在大城市的房价，农民工毕竟是买不起的。大城市的住房所有者比例已经上升到70％。在北京，住宅建成的速度超过了人口增速。这种供应过剩的部分被地产市场“投资者”所吸收。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最近已出售的房产有五分之一空置。由于新房子出租后往往价格下降，所以很多投资者选择把房子空着。公寓大楼夜间熄灯的照片，揭示了投机者的住 房所在。

住宅价格已经高的惊人。摩根士丹利估计，即便支付了大笔的首付款后，供按揭的钱要占平均收入的43%。就全国而言，房价已攀升至收入的8倍左右。

由于收入分配不均衡，这可能低估了承受不起的问题。在北京，房价与收入的比例已经上升超过15倍（2000-2008年平均为10倍）。相比之下，东京公寓价格在1990年达到高峰，为平均家庭收入的9倍。首次购房者据说要通过借家庭成员的钱来凑够首付款。隔代的按揭贷款也是日本20世纪80年代后期房产的一个特点。

房屋已成为一个国家的困扰。最近几个月，几个重要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商都对住房市场的泡沫表示了担忧，但华尔街没有理睬这些担忧。分析师说，如果中国经济继续以其最近的速度增长，那么一切都会变好。

商业房地产市场

商业房地产市场看起来也同样离谱了。作为刺激经济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允许开发商承担更多的债务，以促进土地的购买。去年，商业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了21％。中国正在建设的房屋建筑面积总量相当于罗得岛（Rhode Island）的大小。

按国际标准，在主要城市的商业租金也非常昂贵。去年夏天，在上海和北京的黄金地段，估计分别为每平米702美元和每平方米532美元。这些价格大体上与纽约相同，尽管曼哈顿的人均产出是中国大都市的4倍之多。

国有企业被要求支持商业地产市场。他们标出了很多“地王”。例如，在2009年9月，中国海外发展支付人民币70亿元，购买了上海一块31.3 万平方米的地，楼面地价每平方米人民币22400元。

地方政府拥有所有土地的所有权，已是房地产市场繁荣的主要受益者。卖地收入约占其2009年收入的一半。去年，地方政府获得了人民币1.6万亿的卖地收入，相当于中央的刺激计划的40％，或者GDP的5％。这些收入被循环，作为开发商购买更多土地的贷款。正如前摩根士丹利经济学家谢国忠评论的：“当国有企业借用国有银行的钱，在土地拍卖中把钱交给地方政府，这个地价还有什么意义？”

高层建筑正在纷纷建设，而按西方标准，空置率已经非常高。在浦东新区，空置率已达50％，但新楼还在盖不停。投资者自我安慰，

如果中国的经济保持像这样迅猛生长，那么所有的空办公室将很快会有找到租客。

梦想之地

三年前，温家宝总理用“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来形容中国经济。而经济危机并没有治愈这些个“不”。相反，中国过热的投资和天量的信贷加剧了上述的经济失调。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呈现出了典型的泡沫状态——过高的价格、疯狂的投机以及大量的新建筑物。这个泡沫迟早破裂。

过去，当以上十个红色警报在一个经济体都显现出来的时候，总会发生令人不快的结局。预测泡沫何时破灭非常困难，因为泡沫总能推至极致。加上中国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市场经济，让预测难上加难。国有企业可以被叫来支撑市场。像过去一样，亏损也可以被掩盖起来或塞到某处。但是诸如此类的手段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推迟问题的爆发而已。

就算未来危机发生的具体时间无法预测，也并不意味着房地产市场泡沫的问题就应该被忽视。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在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体系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房地产投资占据着GDP的12%。对于中国的许多重工业，建设是主要的需求来源。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数据，大约有20%的银行新增贷款直接流向了房地产市场。另外，房地产还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来源，北京市去年20%的收入就是来自卖地。而大多数基础设施的贷款要靠地方的卖地收入来偿还。国企的大多数贷款以房地产做抵押。最后在正常银行系统以外，还有一个房地产借贷市场，数字不详。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事实上是中国的整个经济和金融系统，都形成了一个信仰，即未来中国将以过去的速度继续增长。这一假设让更多的投资变得合理，从而刺激增长，进而带来更多的投资。中国的这种现状令人想起互联网泡沫的后期，投资者把过去的增长率套用在了未来，然后被广阔的增长空间所迷惑。伴随着互联网的兴盛，巨大的投资创造的需求似乎印证了最乐观的预测。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梦想之地，一个“先建设，一切都会随之而来”的经济体。

一个评论家把中国与好莱坞的惊悚片《生死时速》联系起来，中国就好像一辆装有炸弹的大巴在路上飞奔，而一旦速度小于每小时50

英里，它就会爆炸。这个比喻很贴切。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8%，灾难可能就会发生。大部分新建的基础设施将会毫无用处。过剩的产能将在很多工业存在很多年。房地产泡沫将会破裂，而银行系统将面临大规模坏账。那些正沉浸于中国梦的投资者忽视了这样的场景。当中国这部巨型机器最终停滞，这些投资者们就会从美梦中痛苦的醒来。